

改变世界的日子

孔东梅 著

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目录

第一章 序幕

011

我有这样一位姐姐 / 外公的九哥 /
外公的初恋 / 到长沙找九哥去 /
海伢子的童年 / “王波”的徒工生涯 /
与外公的谈话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

039

一、30年的变迁
二、初到外交部
“文革”之前的中国外交 / 东交民巷印象 / 火烧英国代办处 /
总理出面处理 / “文革”前期的外交困境
三、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发信号 / 中美关系由来
四、中苏问题
苏方来电 / 两手准备 / 机场会谈
五、外公的预言
基辛格何许人也 / “大外交”初露端倪 /
“追到卫生间”传闻由来

第三章 1970·有朋远来

057

- 一. 斯诺其人
 - 外公与斯诺 / 前4次采访
- 二. 中美关系的曲折
 - 五二〇声明
- 三. 斯诺最后一次访华
 - 天安门上 / 老朋友有请 / 外公急令 /
 - 为何会见斯诺 / 清晨造访 / 难得的长谈 /
 - 石破天惊 / 关于个人崇拜 / 最后一面 / 美国人民是朋友

第四章 1971·小球大球

079

- 一. 两条新闻所引起的
- 二. 美国队访华
 - 要求访华 / 发生转机 / 几则外电 /
 - 外公改变决策 / 总理巧布坐席 / 小球与大球
- 三. 基辛格访华
 - 入住钓鱼台 / 秘赴巴基斯坦 /
 - 初见基辛格 / 北京48小时 /
 - 总理越朝之行 / 总统访华前的准备
- 四. 联合国之行
 - 第26届联大前的中国外交 / 来自纽约的好消息 / 莫忘朋友 / 总理送行 /
 - 初到纽约 / 外国记者的追踪 / 联合国“中国日” / 中国的声音 / 繁忙的外交 /
 - “中国胃”的烦恼 / 两盒巧克力

一、从布什访华想到的

二、黑格访华

准将打前站 / 节骨眼上得病 / 美方的口信 / 中方的反击 /
黑格将军失礼 / 外公指示“升温” / 余波淼淼

三、尼克松访华

冷中有热 / 破冰之旅 / 突如其来的会见 / 外公如何准备 /
基辛格的回忆 / 关于外公的传闻 / 中方主随客便 / 通向红墙之路 /
总统丢了 / 游泳池印象 / 外公的书房 / 两个“魔鬼”见面 /
中美最高级会见 / 北京的雪 / 杭州“捉迷藏” / 上海挽留总理 /
北京欢迎总理 / 外交丰收之年

四、与第二世界国家的交往

田中访华

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

伊朗公主访华 / 城楼之夜 / 长城上跑步 / 针灸记趣 / 公主与邓大姐

“三个世界” / 抚今追昔

第一章 | 序幕

我有这样一位姐姐

1979年，我结束在上海陪伴外婆贺子珍的日子，来到北京父母家，开始上小学二年级。那时，我的外公毛泽东已去世三年。在其后很长一段日子里，妈妈李敏仍是在哀伤和忧郁中度过的。妈妈是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来看望她的人也为数不多。

有这样一位客人——大概是冬天吧，她那一身半旧的绿色军大衣，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妈妈说话柔声细气，慢条斯理，而这客人嗓门高，语速快，她的年纪、个头都与妈妈相仿。这位阿姨是……且慢！妈妈解释说：不是阿姨，你——和她——同辈。我愕然。

哈哈，小东梅！叫我海容姐姐——客人的笑那么响亮，震得我耳朵直响。这就是王海容。

海容的祖父是我外公的姨表兄王季范先生。她是外公的表侄孙女，和我这个外孙女同辈，没错。原来，我有这样一位姐姐。这个“便宜”占的，让人有点不好意思。

海容不谈自己的过去。有人发现我对海容的经历竟一无所知时，惊讶地说：没看过你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吗？里面十次有九次都有王海容！

20世纪70年代，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前都要播放一段新闻加片。那个年代的电影翻来覆去就是那几部，倒是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一年四季常换常新。两位女青年——负责礼宾及记录的王海容和负责翻译的唐闻生几乎每次都出现在外公身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海容成了政坛和影坛的双料明星，在中国和国际的知名度可想而知。

然而，出于保护外婆贺子珍身体和情绪的原因，在她身边，我是很难看到外公接见外宾的纪录片的。我没能把眼前的海容和那位世界闻名的女外交官联系起来。

世纪之交，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打开中美关系那段历史逐渐产生兴趣。由此发现：从外公与斯诺谈话，秘迎基辛格，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到接待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大外交活动，海容都参与其中。

但是，在回忆录、传记和纪实作品中，在电视、报纸和广播采访中，在2001年纪念“乒乓外交”30周年和2002年纪念“破冰之旅”30周年的活动中，为什么都没有海容的声音呢？

2004年，海容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她又一次来我家做客。

还是那身蓝色便服，白衬衫领口的扣子总是系着；一副白边眼镜，梳三七分短发，一双布鞋，一切都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唯一的变化，就是头上的短发全部花白了。海容老了。

“说说您的故事吧，海容姐姐，我想写写您的故事”——我恳求道。

“我有什么好写的？”——海容淡淡地答。

我蓦然想起，当年第一次来到陕北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斯诺，在我外公毛泽东面前也遇到同样的困境。外公对斯诺说：我个人没什么好写的。

我不禁想起外婆贺子珍。外婆与外公于1928年结合，共同度过中国革命最艰

难的十年，他们的儿女只有我妈妈李敏一人确认幸存。此后，外婆远赴苏联疗伤，继而回国休养，她的名字及其背后的传奇不再为人所知。在外婆的晚年，如果不是有热心人追踪采访，留下她的口述，很多动人的情节和历史的真实，外婆和外公的爱情故事，不就随老人的去世而永远带走了吗？

于是，我劝海容姐姐该给后世留下自己所知的真相，海容若有所思。最终，她说：你写你的。我不写。但我可以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于是，才有了您面前这本书。它还远不能写出海容经历过的极其丰富的外交活动，只是对一些她参与的重大事件做了粗线条的勾勒，以展示那段改变世界，也改变中国的日子。

外公的九哥

有谁会忘记自己的童年呢？是的，童年非但一直不曾远离我们的记忆，而且还随着岁月的流逝越发真切起来。童年的玩伴，童年的欢乐，童年的梦想，是每个人终生的宝藏。

外公毛泽东的童年和我一样，最初都是在外婆家度过的。不过，他比孤身在外婆身边的我幸运得多——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有众多的表哥、表姐和他一起嬉戏、玩耍，其中一位就是海容的祖父。我相信，那段日子是外公一生中不可多得的快乐而充满温情的快乐时光。

从外公故乡湖南湘潭韶山冲向西走20里，到了湘乡地界，有一个小村落名叫唐家坨，村里有一大户人家姓文。文家的男主人去世早，家务由女主人贺氏操持。一家人辛辛苦苦务农，逐渐富足起来。贺氏就是我外公毛泽东的外婆。

贺氏外婆有3个女儿。二女文六妹嫁到本县王家，所生第二个儿子名季范，也就是海容的祖父。季范在诸兄弟中排行第九，人称王九哥；小女文七妹嫁到邻县毛家，所生第一个儿子名泽东，也就是我的外公。其实，泽东前面还有两个哥哥，均



外公与王季范先生的外婆家——湖南湘乡唐家坨（后改棠佳阁。故居所在地现为水库）



20世纪50年代的王季范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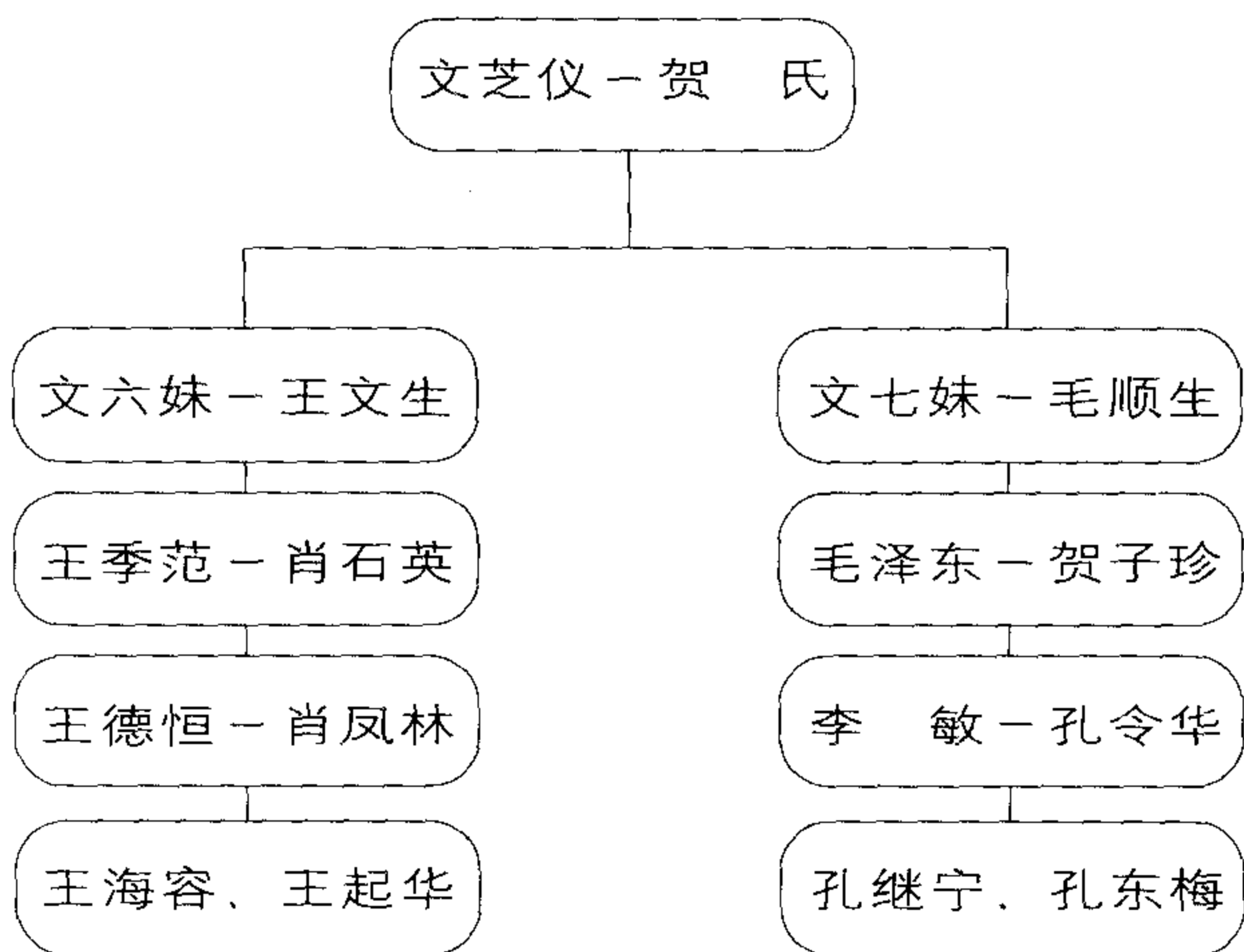
不幸夭折，所以人们称他毛三哥。外公自幼按当地习惯拜石头作干娘，以求保佑平安，小名叫作石三伢子。王九哥比自己的表弟毛三哥大9岁，我外公一直尊称王季范先生为九哥。

晚年的贺氏外婆把一大帮儿男孙子女都聚拢到身边，享受着绕膝之乐。由此，我外公认识了九哥王季范。唐家坨诸兄弟中，王家九哥是年龄较大的一位，这位大哥哥的人品和学问都很受长辈器重。在幼年的外公眼中，九哥是自己的榜样。

说起九哥对我外公的帮助，在我第一部作品《翻开我家老影集》一书中提到过一件事：外公之所以能够第一次走出韶山冲去湘乡读书，由此大大开阔了眼界，他的九哥王季范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当时，外公的父亲反对此事，外公央求九哥：“我要读书！”。最终，九哥的一句“不读书就没有用！”说服了老人。

后来，王季范先生成为湖南著名教育家，多年致力于在长沙主办衡粹和长郡两所名校。他的学生有不少是知名科学家，海容记得其中很多人都来家里看望过老人家。

海容与东梅的简明“家族树”



注：“家族树”（Family Tree）是西方的说法，类似于中国的家谱。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为便于直观说明海容与东梅的亲属关系，本表只列了我们两个及其兄弟和直系长辈，王、毛两家其他的兄弟姐妹关系均从略。

然而，与海容接触后，我开始进一步思考外公离乡求学背后，是否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外公 17 岁那年发生的事情，也许并不像我们所知的那么简单……

外公的初恋

1910 年大年初二，外公第一位妻子罗氏因病去世，卒年 21 岁。外公那年 17 岁。关于罗氏，1936 年外公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做过介绍。由斯诺根据外公口述

整理的《毛泽东自传》中这样记载：

“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1]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研究者坚称：外公与发妻罗氏的感情是很好的，并举他在罗氏去世后仍与罗家保持联系为例。据说，当地还有这样的俚语：“没媳妇留不住。”因此，有人认为如果罗氏没有早逝，也许外公就不会走出韶山冲……

以上观点是否有道理，已不属于本书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这倒给我探寻外公为何决意去外地读书以启示。这，还要从与海容的一次谈话说起。

在我提出给后世留下自己的亲历亲闻，留下自己的声音这一建议后不久，海容再一次来看我妈妈。她笑着对我说：要听故事啊？那我就讲一个你们谁都不知道的。

那果然是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故事。

原来，20世纪50年代，外公在海容去看他的时候问过一句话：

“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王十姑是谁？海容不知道，自然无言以对。回家后，便去问自己的奶奶——王季范先生的夫人肖老太太，外公称她九嫂。

奶奶告诉海容：王十姑是她爷爷王季范的妹妹。和外公的母亲文七妹一样，她没有名字，大家只叫她王十姑。王十姑和我外公是两姨表亲，从小就是在外婆家一起玩，一起长，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直至谈婚论嫁。

这就是所谓“中表婚姻”，在中国古代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小说《红楼梦》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婚恋关系了。其实，中表婚姻离我们并不遥远，中国20世纪不少革命伴侣仍属此例。直到1954年《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近亲结婚，它才逐渐成为历史。

无疑，这就是外公的初恋。可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位王十姑呢？

一百年前的中国，很多事情与今天不同：表亲能结婚，八字不合不能结婚。就任外公和十姑翘首以待好事成双的时候，算命先生得出结论：二人八字不合。亲事不成了。

怎么办？！外公当时只是一个少年，用海容的话说——“还没掌握什么马克思主义”。造化弄人，对于约定俗成的迷信习俗，谁又有回天之力呢？这种悲剧当时是经常发生的。

王家给十姑订亲了，丈夫是本县的，姓赵。到王十姑出嫁的那天，外公也来了，他来抬春箱——就是娘家送女儿出嫁准备的箱子，里面都是被子，衣服。春箱是要娘家人抬的，外公挤进来当了一回娘家人。我想，这是为了最后看一眼十姑吧？

很快，大概是1907年的样子，毛家也给我外公订亲了。妻子是本县的，姓罗，而且是毛家的远房亲戚。罗氏也没有名字，人们叫她“罗一姑”。王十姑同罗一姑一样，都是婚后不久去世，都没有后人，只有墓上的衰草陪伴着她们。

十姑嫁人了，一姑去世了，外公再也不想在家里呆下去了。他向往一个新的别样的世界。

终其一生，外公痛恨包办婚姻，疾呼妇女解放。在外公那一代革命者共同努力下，八字拆散有情人的荒诞事总算在新中国基本划上了句号。并且，在外公支持下，他的儿女——我的舅舅、妈妈和姨妈都拥有了婚姻自主权，自主选择了各自的终生伴侣。

然而，外公是永远忘记不了十姑的。王家兄妹三人，除了王季范和王十姑外，还有一位是他们的哥哥王星臣。王星臣的女儿王曼恬曾告诉过海容，自己抗战时期去延安后，外公见面第一句话把她问得摸不到头脑：

“那个王十姑——怎么样了？”

原来，王曼恬也对此事一无所知。得知十姑早已去世后，海容告诉了外公。外

公叹了口气，说了一句：

“哦……因为心情不好。”

在海容面前，外公不止一次提到王十姑。老人家动情地回忆道：她是个好人。人很白，性格很好，手很细——我们还拉过手哩！这时，外公似乎又回到了少年的幸福时光。

在海容得知王十姑一事的来龙去脉后，王季范先生告诫她：“不要乱说！”王毛两家的这段故事已深藏百年。如果不是海容讲出来，又有谁知道呢？



外公看报（1961年）

到长沙找九哥去

外公离家来到湘乡读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进而，他向往湖南省会长沙，希望到那样一个大地方去。重要的是，他的兄长——九哥王季范已在那里当上了老师。对，到长沙，找九哥去！1911年，18岁的毛泽东——我的外公终于如愿以偿，满怀兴奋地来到了这座省城。

长沙确实是个大地方。在这里，外公平生第一次见到“新的”报纸。

之所以要加上“新的”这个限制词，是因为此前外公从他的表哥文运昌那里借来并熟读的《新民丛报》，已是该报几年前的合订本。毕竟是20世纪初，在湘潭韶山冲和湘乡唐家坨那样中国内陆的偏僻山村，能找到“旧的”报纸就算很不容易了。

报纸——外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这个神奇的东西！清朝终结，民国初建，中国报业呈现大繁荣，万花筒般纷繁多元的思想潮流每天涌现在报端。外公由此养成读报的习惯并保持终生。一直到临终前几个小时，他还在看汇集外电的《参考资料》。

也是在长沙，外公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地图。

那是外公19岁到20岁之间发生的事情。近40年后，外公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家中向周世钊等同学好友说道：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1]

那是一张“世界坤輿大地图”。它使外公身心为之震撼。

世界之大，确实不是为逃避严父责罚在韶山冲绕圈、为投奔外婆怀抱在唐家坨流连的石三伢子能够想象的。

在这张地图上，中国只是世界之一国，而且并不是最大的一国；中国所在的亚洲也只是世界之一洲，旁边还有一个要比它大得多的太平洋。而在地球的两端，广袤的欧亚大陆分布着亚洲和欧洲，相隔浩瀚的太平洋东西两岸分布着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

说外公的世界观念从此形成，也许为时尚早。但从此外公对世界地理开始格外留心。1913年到1918年，20岁的外公由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的九

哥王季范介绍，考入这所师范学校，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段校园生涯。他对报纸和地图的兴趣在此充分表现出来。

外公的同学周世钊回忆说：

“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堂时间去看报。看的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多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称他是‘时事通’。”^[3]

另一位同学萧植藩（萧三）回忆说：

“那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年代。毛泽东就好像是给同学们作每周以来



世界地图前的外公（1961年）

国际国内的军事政治的时事报告：奥国的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死，德国威廉第二怎样出兵，德俄、德法、德英如何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参战’发财，日本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1]

在政治方面，外公也崭露头角。一次，外公为抗议第一师范校长张干提高学费发起“驱张”运动。教育当局追查下来，提出开除毛泽东等“肇事者”。此时，王季范先生又一次向外公伸出援助之手。他联合其他教师力保外公，外公才得以化险为夷。这也是为人所熟知的事情了。

然而，海容提供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由于校方态度强硬，为保我外公无事，王季范先生忍痛劝一位也参加过“驱张”但情节较轻的王姓学生退学，这个学生是自己的本家亲戚。此人退学后，由于心理郁闷，后来竟精神失常。王老从此默默负担起他一家老小的赡养，却从未向别人提及此事。海容童年由母亲带着去王家祖屋湘乡杉木塘玩耍的时候，还见过此人。

第一师范的学习，成为外公腾飞的台阶。此后，外公踌躇满志地去了北京，去了上海……他开始忙于政治活动，在此基础上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就这样，外公与他的九哥王季范先生见面越来越少，这对感情深厚的表兄弟不得不分别一段时间，然而这一分就是二十多年。不论对外人还是对家人，王老先生对这层关系讳莫如深，所以，海容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位亲戚。

海伢子的童年

1938年，海容出生在湖南长沙湘雅医院。当时，王季范先生是长沙名校长郡中学的校长。不久，日军轰炸长沙，海容被妈妈带着到湘乡外公家避难。那里名叫新屋嘴湾，离海容祖父家的王家老屋也不远，翻过山就是我外公的故乡韶山。

海容的父亲是王季范先生的独子王德恒烈士。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支持石三伢子的九哥得知表弟已成为中共领袖毛泽

东，于是派儿子前往延安，希望他能为国家、为抗日尽一份力量。王德恒由外公的弟弟毛泽民介绍入党，在抗大完成学业后，被派回老家湖南，准备做地下工作。1941年，他在湖南桃江县桃花江坐渡船时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追捕。王德恒水性很好，本想跳船逃生，不幸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0岁。当年海容3岁，弟弟王起华1岁，这对姐弟对自己的父亲没有任何记忆。

海容的父亲是湖南大学学经济的。母亲肖凤林也是湖南大学学生，开始是学化学的，后来改学财务，在银行工作。父亲牺牲后，母亲独力支撑起这个家。海容的外公原为湘军程潜部下，官至旅长。他也是个读书人，因为看多了官场变换和沙场征伐，很早就解甲归田。海容的童年就是在自己外公的小庄园里度过的。

海容的名字是她祖父王季范起的——有道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是林则徐的两句名言。祖父希望她做个有大气量的人。不过经常有人将其写成“海蓉”，不知这是不是出于把“中南海”与湖南古称“芙蓉国”放在一起的联想？只是这与本义相去甚远。海容对此实在有些无可奈何。

童年的海容被人们称为海伢子。她在外公家一直住到抗战胜利，才回长沙上小学。那几年，妈妈让海伢子与大她一两岁的胡姓佃户的女儿作伴，海容记得自己叫她胡姐姐。这位农家姐姐每天带着海伢子放牛啊，采野菜啊，采桑叶呀，下水田啊，去井里提水啊。胡姐姐干啥，海伢子就干啥，钻房上树，爬山涉水，过得无拘无束，悠哉游哉。湖南多水牛，海伢子有时爬上水牛背上坐坐。牛虽大却温顺，不必担心摔下来。其实，海伢子经常有因为淘气而摔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不过她无所谓。

海容记得，和胡姐姐在一起的时候，她们都不穿鞋，和农村的孩子一样光着脚。有时光脚丫跑到水田里玩耍，脚上经常粘上吸血为生的蚂蝗。海伢子问大人怎么拿下来？农夫把自己抽的水烟袋里的水放上去，蚂蝗自己就缩小了，掉下来了，血也随之流了出来。虽说蚂蝗吸血时并不疼，不过要是别的小孩，也早就吓哭了，



外公与文家亲属合影之一（1953年，丰泽园）

后排左起：李敏（长女）、毛远新（侄子）、朱光（表外甥女婿）、刘松林（长媳）、李讷（次女）、王海容（表侄孙女）

前排左起：两位表嫂、文静纯（三表姐）、毛泽东、王季范（九哥）、肖石英（九嫂）、刘媛英（表侄媳）（括号内为合影者与外公的关系，下张照片同此）



外公与文家亲属合影之二

左起：不详、文静纯（三表姐）、文运昌（表哥）、赵棣棣（表外甥孙女）、毛泽东、章科伦（表外甥孙女）、不详、章淼洪（表外甥女）、王季范（九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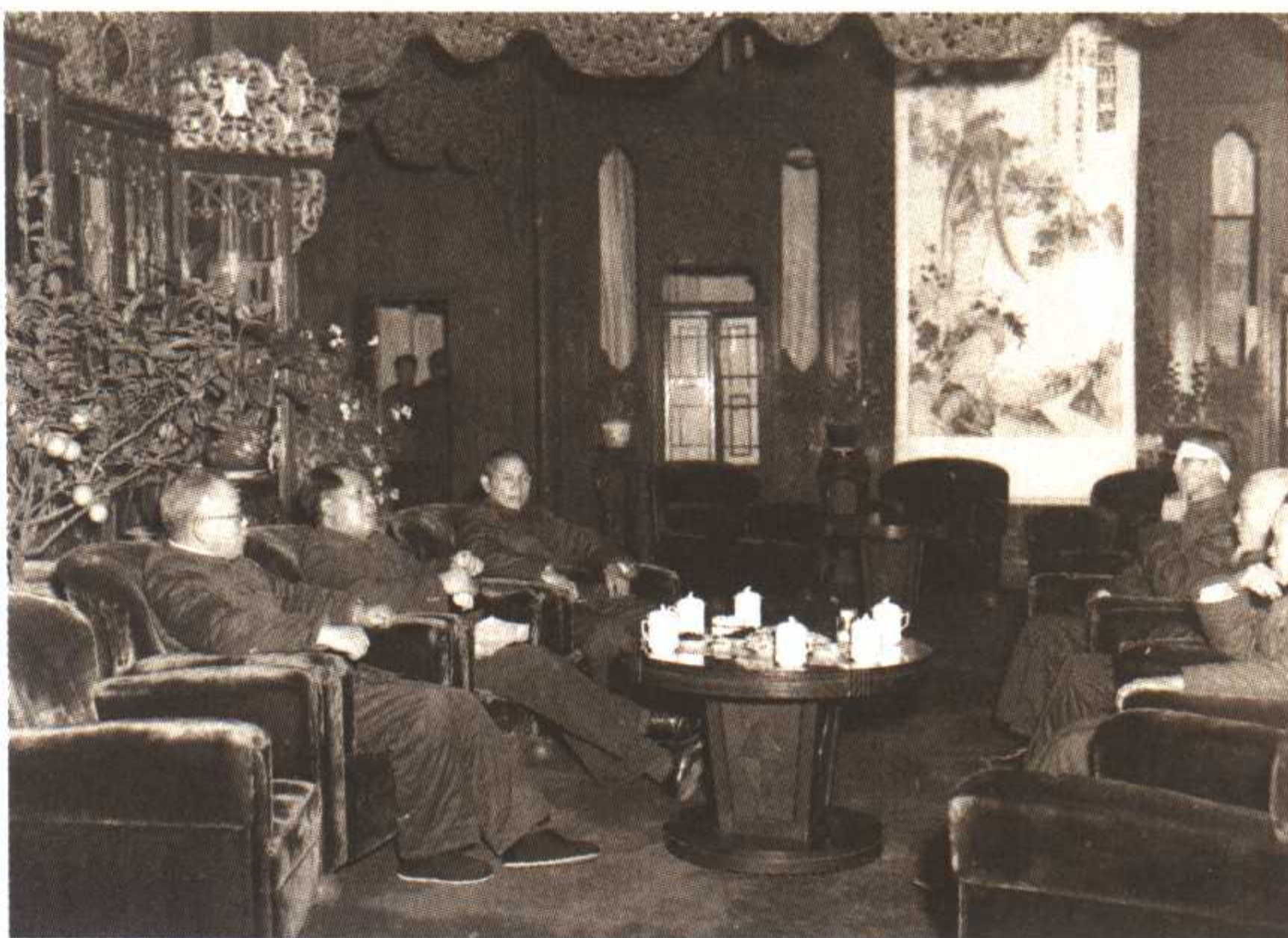
海伢子还是无所谓。

自从去长沙上学，海容再没回过外公家，也没见过胡姐姐了。她记得胡姐姐家里很穷，有时走亲戚没有衣裳穿，来借海容的。胡姐姐对海容性格形成影响很大。如今，年近古稀的海容回首当年，觉得自己在后来的人生中不怕艰苦，性格顽强，这和童年农村的生活，和胡姐姐是分不开的。

海容在湖南一直呆到小学毕业。20世纪50年代初期，外公的唐家坨诸兄弟想去北京看望他。文家公公对海容说：“海伢子，我们去北京，你要么子东西啊？”海容答：我要大苹果——她听说北京的苹果又大又红，好吃。

文家公公又说：你怎么不写封信给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在那时的海容听来，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称呼。于是，她给这位没见面的长辈写了一封信，一是问候，二是想要一个篮球——那时她是校篮球队员。等到文家公公从北京回来，只带回苹果，没带回篮球，海容挺失望的。这就是她和我外公的第一次交往。

建国初期，王季范先生到北京开会时被我外公挽留住下，后来，海容来到北



外公与文家亲属留影之一
左一王季范、左二毛泽东



外公与文家亲属留影之二
左一王季范、右一毛泽东



外公在明十三陵看文件（1954年，北京）



外公与王季范、程潜等在明十三陵长陵明楼休息
（1954年，北京）

京，和祖父住在一起。有一次，她和几位文家亲戚一起，由王老带着进了中南海，第一次见到我的外公毛泽东。海容曾问祖父，该怎么称呼这位亲戚？祖父说，应该称呼“主席公公”（湖南话称祖父为公公）。

第一次见面，海容一点也不紧张。大人们在丰泽园颐年堂聊天，她就吃着玩着，东瞅瞅，西看看，很是自在。临走的时候，海伢子与主席公公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主席：你这个人挺怪的，第一次见我我也不害怕？

海容：我干嘛怕你啊？也不会吃了我！

主席：你给我写过一封信。我忙，没有给你回信。

海容：我还向你耍了个篮球，你也没有给我！

已走到门口的文家亲戚听到这番

对话，都回过头来，哈哈大笑。

那次，年轻漂亮的江青也带着李敏和李讷出来见过客人。海伢子叫了江青一声“三奶奶”。不过后来海容听说，江青不喜欢这个称呼，就不好再叫了。想来也是，当年江青不到40岁，叫“奶奶”着实显得老气了些；更何况还是排行第三呐……



姑娘们随外公等在官厅水库工地。左起：王海容、程熙(程潜之女)、李讷、叶燕叶丽亚姐妹(叶子龙之女)、李敏



外公与亲友郊游在明十三陵石像生前合影
(1954 年，北京)
左起：王季范、毛泽东、程潜、程星龄(程潜之弟)

于是，如何称呼江青，对于海伢子来说成了一个难题，大多数情况是含糊过去算了。好在那时江青经常外出养病，不怎么在家。后来，海容工作了。见到江青的时候，就和大家一样，称她江青同志。

此后，每每想起这次见面，海容都会觉得当年的海伢子是那么的好笑。

在外公一家的重要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人海伢子从没见过，那就是我的舅舅毛岸英。

海伢子来京时朝鲜战争已爆发，岸英舅舅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对手是以美国

军队为主的联合国军。不久，岸英舅舅在美国军队对志愿军总部的空袭中牺牲，时年29岁。

朝鲜战争反映出以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存在着的尖锐冲突。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矛盾，决定了二战后几十年间的国际格局。从朝鲜战争开始，中美两国逐渐走向相互隔绝的状态。

在新中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海伢子，对于美国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都是负面的，比如“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经济危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等等……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海伢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改善中美关系，进而改变国际格局的历史性事件的参与者。



外公在明十三陵休息（1954年，北京）

“王波”的徒工生涯

1958年海容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她走上了从学校到工厂，再从工厂到学校的人生之路，指路人就是我的外公毛泽东。

海容在北京化工厂当了3年学徒。当时每月工资18元，中午饭和晚饭发饭票，每天一杯牛奶。化工厂的工作对人体会产生毒副作用，所以发了口罩、帽子、工作服，还有一双胶鞋。中午饭是鱼、鸭、鸡、肉，晚饭也还是鱼、鸭、鸡、肉。别看吃的不错，工作着实累人。晚上经常加班，支援别的车间。几十斤重的蒸馏水瓶，海容一个人在半夜里搬上搬下。厂子是边建边生产，工人们三九寒冬也住在未完工的车间里，夜里刺骨寒冷。不过，海容至今觉得这对自己是个极大的锻炼，工厂生活让她学会了独立应对许多事情。

3年徒工生活，让海容写出了一篇文章，那就是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1960



外公在抗议美帝侵略刚果（利）大会上向首都群众挥手致意（1964年）



外公在首都150万人支援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大会上（1965年）



外公在支援越南人民反美大会上阅读我国政府声明
(1965年)



外公在支援越南人民反美大会上 (1965年)

年第23期上的《我的经验》。

通过辗转寻找，我拿到了那期杂志。在首页目录中，海容的文章标题用黑体标出，登在第28页。翻开文章，标题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首先是4个大字——“我的经验”；旁边是4个小字——“徒工王波”。

那么，海容为什么还有“王波”这样一个名字？“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的笔体又为什么与外公的“毛体”如此相似呢？

1960年8月1日，海容给时任外公秘书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叶子龙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叶伯伯：

《中国青年》杂志社约我写一篇当学徒工的体会和认识的文章，以便帮助广大



外公与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合影（1959年元旦，北京）

前排左四王季范、左五毛泽东、左六郝治平、左七罗瑞卿

二排王季范、毛泽东之间为王海容，郝治平、罗瑞卿之间为李敏

二排左三王起华，三排左三孔令华

的青年徒工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同时，他们还希望能够得到主席公公对青年徒工的指示和希望。稿子我已写好了，想请主席公公在百忙中抽一点点时间替我修改一下。”^[5]

原来，团中央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经常接到一些工厂徒工的来信，他们大多不安心当徒工。其中许多人认为：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去当徒工是“大材小用”，是“屈才”。

为了给广大徒工和学生释疑解惑，《中国青年》准备刊登有关稿件。这份当时

在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青年刊物曾请海容当通讯员，不过她没答应。海容喜欢自由，通讯员则需要定期交稿。当过徒工的海容，对徒工生活有一些体会和感受，此事很对她的心思。于是她写出了初稿并附在信后，托叶子龙转交外公修改。

两个半月后的10月17日，外公在来信上批示后退给叶子龙，他写道：

“找王海容今天下午3时15分来这里一谈。”^[6]

那天，海容骑车来到中南海，与外公谈了几乎一个下午。外公对海容在工厂的



外公主持长女婚礼时与来宾合影（1959年，丰泽园）

前排左起：曹轶欧、邓颖超、蔡畅、李敏、孔从洲、毛泽东（左右儿童为毛远志子女）、孔令华、王季范等。
二排李敏、孔从洲之间为王海容，王海容左侧为王起华

我的經驗

徒工 王波

編者按：“我的經驗”是一篇好文章。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經驗，对有高中文化水平的知識青年当徒工是不是屈才，青年徒工應該如何去体会今天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應該如何迅速地去掌握階級斗争知識和生产斗争知識等問題，都作了清楚的闡述。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應該如何正确認識書本知識与实践的关系和革命者應該如何对待革命工作中的錯誤缺点这两个問題。文章中說：“我們要牢牢記住，真正的知識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書本知識只有在書本的作者們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觀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則，書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夠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又說：“在上面，我講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沒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錯誤缺点的嗎？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們工人階級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錯誤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我們認為，真正从思想上把这两个問題弄清楚，对于我們广大青年是有益的。我們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这篇文章。

《我的经验》一文标题及编者按影印件。“我”字前的符号是当年读者留下的阅读标记

表现是满意的，他高兴地看到：当年天真地向自己要苹果和篮球的海伢子，已成长为光荣的劳动者。因此，外公仔细修改了稿子，还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比如，他以海容的口气加上这样一句话：

“虽然我对过去工人的那种艰苦生活没有亲身的体会，因为我在1949年全国解放时才是一个十一岁的‘黄毛丫头’，什么事也不懂；但是在北京化学工厂从许多老工人的谈话中使我体会到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与解放前的生活和工作对比起来，实在太幸福了。”^[1]

外公添加的另一句话是：

“在上面，我讲的全是些好事情，这是真的。难道没有一点坏事情，或者叫作错误缺点的吗？当然是有的，年年有的，月月有的。怎么对待呢？以我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姿态，把所有错误缺点，一件一件克服掉。”^[1]

外公不但帮海容通篇修改了文章，还专门写了编者按。外公这样写道：

“我们要牢牢记住，真正的知识是在实践中得来的，任何书本知识只有在书本的作者们在实践中反映了客观真理，才算是真正有用的。否则，书本上的道理便只是无用的假道理，决不是能够改造世界的有用的真理。”^[2]

这句带有浓厚毛氏风格的语言，为海容的文章增色许多。

为什么不署海容的本名呢？原来，外公对海容说：

“要是别人知道是我给你写的编者按，别人找你怎么办啊？”

海容从没考虑过这些问题，她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公想了想，说：“那你就写徒工王波吧，波浪的波。”

又过了一个半月，1960年12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经外公修改过的这篇文章。

“我的经验”和“徒工王波”8个字都是外公亲笔写的。因为文章的读者是青年，所以写的是比较工整的行书，而非龙飞凤舞的“毛体”草书。

外公加写的3段文字及那段批语，后以“对王海容《我的经验》一文的修改和批语”为题选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该卷目录上，这一篇标题也是与



《中国青年》1960年第12期封面



外公与我妈妈等子侄辈合影（1962年，北戴河）
后排左起：毛远新、孔令华、王博文、王海容、王起华、李讷



外公70大寿与我妈妈及海容合影（1963年，北京）
左起：毛远志、王海容、毛泽东、李敏（身前儿童为毛远志的女儿曹利亚）、孔令华

众不同的黑体。原来，在文稿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为方便读者，将编者认为内容较重要的文稿的标题，在目录中用黑体字排出。”

海容在《我的经验》开头写道：

“1957年是我高中学习阶段结束的一年。我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和各种各样的幻想渡过了这一年。那时，我想将来我要当一名红色的人民教师，我又想当一名化学工程师，我还想做一个喷气式飞机的制造者……总之，那时我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最后我终于决定了自己的志愿——学化学，将来为祖国的化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我的这个志愿却没有实现，当年我没有考上大学。我感到非常苦恼和惭愧，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们青年的期望，同时也辜负了辛勤栽

培我们的老师们。怎么办呢？”

“我想自己是一个共青团员，应该以革命的人生观来对待一切事物。于是，我和同学们就组织了自学小组，在家里自学……几个月的自学生活真是够我受的。1958年初大跃进的锣鼓敲响了我，我觉得再也不能呆在家里自学了，我们青年人应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浪潮中去。”

“我决定要去参加工作，我将这种想法告诉了家里，家里人不同意我出去工作，要我继续升大学学习，我想既然得不到家里的支持，就没有同家庭商量的必要了，我只好独断独行吧！因此，我就瞒着家里满市奔跑找工作，后来终于到了北京化工厂当徒工。我把入厂手续都办好了以后才告诉家里的，我想反正入厂手续已办好了，管你同意不同意，我是一定要去的，家里人对这种独断独行的举动真是无可奈何，后来也只好同意了。”

与外公的谈话

《我的经验》发表不久，在外公的建议下，海容重新选择了上学。她在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和外语系学习期间，与外公就教育问题做过几次长谈。

海容记得，其中有一次她向外公反映过：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爱看古典作品，大家忙着练习英语，他却看《红楼梦》。

外公问：你读过《红楼梦》没有？海容说：读过。外公又问她喜欢《红楼梦》中哪一个人物？得到的回答是——“我哪一个也不喜欢”。

外公是喜欢看《红楼梦》的。他开导海容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本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那个凤姐写活了。凤姐这个人物写得好，要是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外公还问海容：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佛经”？海容不解地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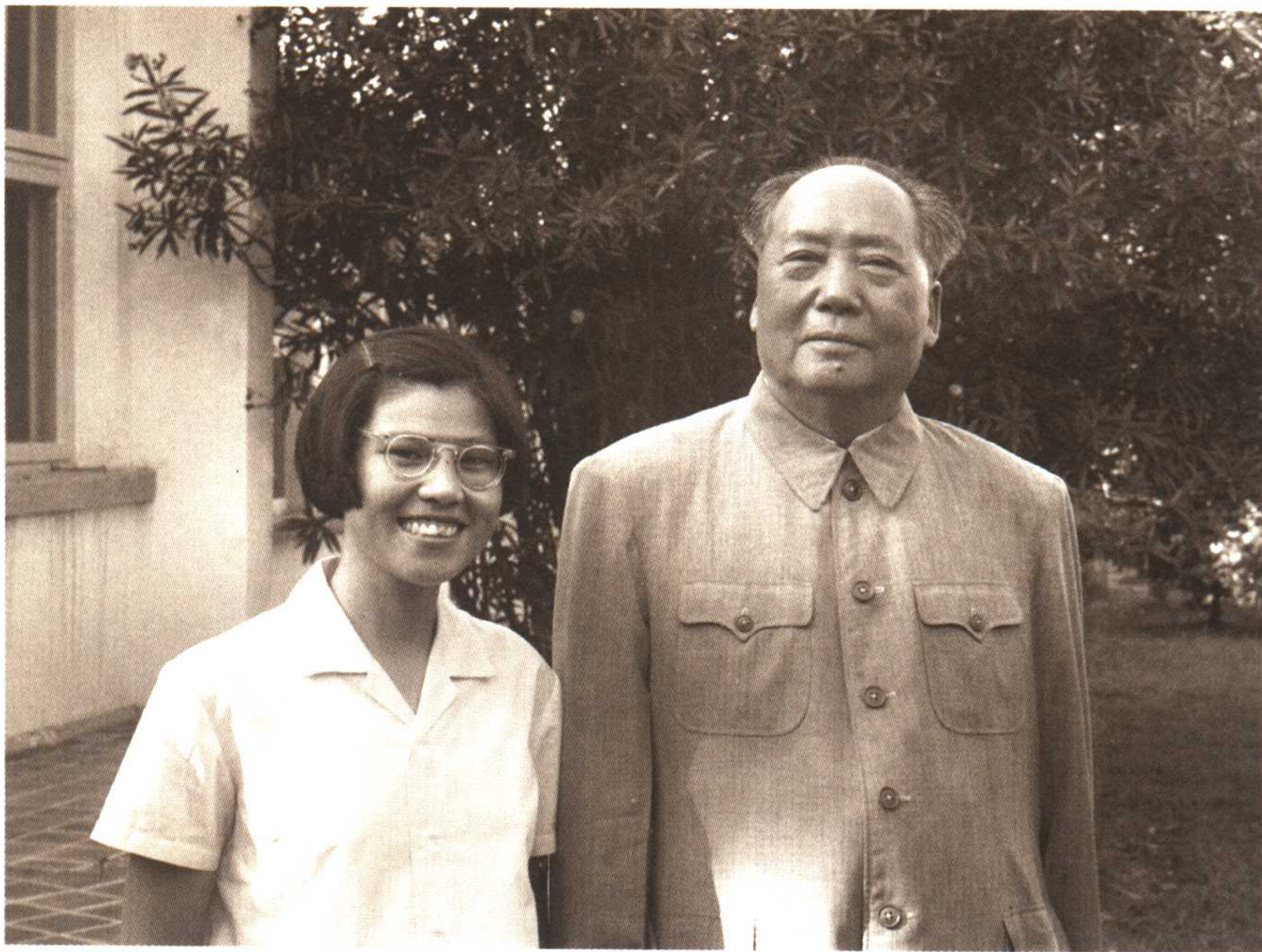
外公与海容关于教育的谈话影响了一代青年人。图为外公在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1964年2月13日）

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外公不以为然地说：要做翻译，搞外文，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

他又问海容：你读过《聊斋》没有？得知她没有读过，外公介绍说：《聊斋》可以读，写得好。《聊斋》里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

在风趣渊博的谈吐背后，是外公对教育、对读书的独到见解以及对下一代的深切期望。后来我得知，外公与海容的这些谈话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外公与海容姐姐合影（1966年）

注释：

[1] 埃德加·斯诺录。汪衡译：《毛泽东自传》第29页，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

[2],[3],[4] 周世钊：《毛主席的青少年时代》，《芙蓉》，1978年第7期

[5],[6],[7],[8],[9] 中央文献研究室：《对王海容<我的经验>一文的修改和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314-3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第二章 | 1969·初露端倪

一、30年的变迁

大约在1999年前后，也就是我去美国留学的那一年，中国人耳边开始响起这样一个新名词：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美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欧洲联盟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许多国家都结成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上述“战略伙伴关系”各自含义不尽相同。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较之海容30年前在外交部工作的年代，中国的外交格局有了相当大的变化。这一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带着这些问题，我向海容请教。在把她提供的一个个历史事件片段加以拼接组合后，我对外公晚年宏大的外交实践有了新的认识。



北京外交部街33号－中国百年外交机关旧址



外交部旧址悬挂的文物铭牌

二、初到外交部

在此先要介绍一下海容进入外交部的情况。

1965 年，海容结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进修，去外交部报到。她被分配在部办公厅综合组，人们称这位 27 岁的年轻人为了“小王”。

外交部第一任部长由周恩来总理兼任。建国近三十年间，由国务院总理兼任部长的仅此一例。海容入部时，部长系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兼任。部领导还有：常务副部长章汉夫、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曾涌泉、罗贵波、耿飚、刘晓、韩念龙、刘新权、王炳南以及徐以新、陈家康……

“文革”之前的中国外交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之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公告，表达新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友好交往的意向。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是苏联，时间是1949年10月2日。此后，包括保加利亚等12个东欧及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是印度，时间是1950年4月。此后，印度尼西亚等8个亚洲国家与中国先后建交。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北欧国家是瑞典，时间是1950年5月。此后，丹麦等5个北欧国家与中国先后建交。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西欧国家是英国，时间是1954年，此后，荷兰也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是埃及，时间是1956年。此后，叙利亚等21个非洲国家与中国先后建交。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美洲国家是古巴，时间是1960年。

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欧国家是法国，时间是1964年。

截止到1965年，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的5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东交民巷印象

海容报到时，外交部办公地点还是建国之初的旧址，即北洋政府外务部原址。1966年春天，一场建国以来对北京影响最大的地震——邢台地震发生了。外交部原办公处所均为百年以上的老旧房屋，为了防震，一部分部



乔冠华、龚澎夫妇

领导搬到东交民巷办公楼。在这里，初到部里的海容认识了许多人。在海容楼上办公的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年五十多岁的她风度翩翩，精明强干，而且和蔼可亲。

海容在外交部还结识了一位同事，并成为自己终生的好友，她就是唐闻生。唐闻生比王海容小5岁，父亲是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国局书记的唐明照，母亲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张希先。1943年，唐闻生出生在纽约，她的中国名字“闻生”取义“闻父归而生”，美国名字是 Nancy Tang。

1952年，唐闻生随父母回国。1962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用3年时间学完规定的5年课程。她比海容早半年进入外交部，分配到翻译室任英文翻译，大家叫她“小唐”。



北京朝内大街225号外交部旧址



外交部小礼堂旧址（原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



外公读书（1961年）



外公丰泽园书房一角

火烧英国代办处

转过年来就是1966年，这年的春天和夏天过得格外不寻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交部机关工作人员纷纷成立群众组织，分为“造反”和“保皇”两派。不过，不少人还是和海容一样，属于“逍遥派”。

与国家部委不同，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随时都会引发国际事件。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

1949年新中国成立，英国是最早与中国洽谈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但是，中英虽在香港问题上取得暂不改变现状的共识，但在台湾问题上却难以达成一致。因此，两国只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处于半建交状态。英国在北京所设代办处简称英国代办处。

由于外交系统造反派中极左分子受到中央文革成员王力8月7日讲话的蛊惑，一度夺取了外交大权。在外交事务中违背党的政策，导致了严重的外交事件。

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

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这就是“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得到汇报的总理当即下达指示，通过高音喇叭呼吁在场群众散开，但无济于事。

局势混乱至此，总理不得不向外公汇报。正如外交部很多同事一样，海容也想不通，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反映外交系统造反派的荒唐做法。海容记得自己也给外公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

外公当时在上海，接到总理的报告和各方面的信息后，果断解决了中央文革的极左分子王力、关锋（后来还有戚本禹），打击了极左的势头。

这年9月份，外公由上海返回北京。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去看望他，当面反映了外交部的事态。在谈到王力8月7日讲话时，外公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外公还向海容他们讲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海容当时不知道出处，回家请教祖父，得知这是唐人罗隐的作品。

那次外公向王海容、唐闻生明确表示：外交部要反对极左。海容回去后，尽可能地向外交部同事做了传达。

外交部“批极左，抓坏人”的斗争，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展开的。这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文革”以来极左派的势力，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外交系统部分机构的领导班子，许多有经验的老外交家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由此，奠定了此后开展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组织基础。

总理出面处理

“火烧英国代办处”发生后，海容向外公反映说：那样做法实在不好。外公肯定了她的想法，表示应向英国方面道歉。海容随即向外交部领导汇报。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事的进展并不顺利。最终，还是由周总理亲自出面处理。1971年3月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公开表示了中方的歉意。他说：

“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十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1]

“文革”前期的外交困境

“文革”初期，特别是1967年5月至8月的3个月，是中国外交经受巨大波折的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上述困境必然直接影响中国外交关系的开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1965—1970）记载，在“文革”的前4个年头（1966、1967、1968、1969），中国只是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与也门（南）和越南南方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情况下，调整外交政策，批判极左思潮，势在必行。

外公和总理审时度势，扭转了在外交方面“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混乱局势。他们多次亲自向来访贵宾及驻华使节解释外交政策，表达中国愿与建交各国恢复和发展关系的愿望，使外交工作重新有了起色。1970年，中国与加拿大、赤道几内亚、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和智利等5国建交，为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三、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发信号

1967年10月，外公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

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当时，美国是中国两个头号敌人之一——这两个敌人，一个被叫做美帝（帝国主义），一个被叫作苏修（修正主义）。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从而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发出有意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信号，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接收到了。1974年12月12日，周总理在医院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总理对客人说：

“现在我把我们方面的事情告诉你。打开中美关系，是毛主席的决策，他很早就读了尼克松1968年当选以前写的一篇论文。当时我们都未读过，只有毛主席注意到了，他告诉了我们，我们才读了。基辛格博士说了公道话。他说，打开大门的，在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的决心。基辛格没有想到，而且当时还有相反的想法，他是后来才跟上的。当然这不是要贬低博士在恢复、发展中美关系中的贡献。他是有一功的。”^[2]



毛主席与访问延安的美国特使赫尔利等留影
左起：黄华、赫尔利、毛泽东、张治中（1945年，延安）

外公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总理也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所考虑的重大问题。

中美关系由来

中美两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是互相支援的盟国。



毛主席在延安设宴招待美国特使马歇尔（左一为章文晋）（1946年，延安）



毛主席会见美国客人（1959年，武昌）
左起：浦寿昌、唐明照、斯特朗、毛泽东、杜波伊斯

在此期间，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外公去过重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延安受到外公热情的款待。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由于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同时卷入中国内战，外公写下《别了，司徒雷登》并宣布“一边倒”政策，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渐行渐远。

1949年成立新中国伊始就和美国处于不友好的状态。1950年，美国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又在朝鲜兵戎相见，中美两国成为准交战国，关系迅速恶化。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的联系仅维持在朝鲜板门店和波兰首都华沙的大使级谈判，但谈判不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阻挠中国解放台湾，在联合国带头反对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中美两国几乎断绝了一切来往，处于完全敌对的状态。1965年，美国发动越南战争，对中国形成新的威胁，两国关系更趋紧张。

1968年11月，尼克松在竞选中战胜约翰逊，成为美国第37任总统。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利用这一全球瞩目的时机，又一次就改善中美关系发出

信号。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对于“美帝国主义头子”的讲话，中国照例准备给予抨击。根据外公的意见，《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既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同时又刊登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

四、中苏问题

苏方来电

美国总统尼克松刚刚就职并做出对华缓和姿态，苏联领导人便从霸权主义、扩张主义思想出发，对华态度渐趋强硬，并由两党论战最后发展到破坏两国关系。1969年3月，苏联单方面改变边境现状，武力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史称“珍宝岛事件”。两国界河上的隆隆枪炮声震碎了中苏同盟残存的最后一点脆弱联系，形势十分危急。

据当事人——外交部苏欧司代司长李连庆在《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一书中回忆：此时苏方领导人也感觉到了情况的紧急。苏联首脑柯西金启用中苏热线电话，



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机场会谈”后送客人登机（1969年9月11日）

准备亲自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通话，试图了解对方意图。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中方一位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不但拒绝为他转接，还严辞痛斥道：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话务员愤怒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挂断了电话。最初听说这一故事，我以为多半是民间的野史传闻，从海容这里才知道确有其事——总理曾指示应对那位女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几天后，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总理通话。外交部苏欧司答复说：你们苏联党已变成修正主义了，中苏两党已断绝关系了，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3]无奈之下，苏方改由外交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苏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电话同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两手准备

3月22日凌晨，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中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4]

总理在报告中说：

从二十一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我方打听主席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我方在珍宝岛方面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后方在催他们前沿行动，“估计敌今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5]

当日，外公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6]林彪也随即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仍然是箭在弦上。

珍宝岛事件惊醒了世界。一个紧随美国总统身后的人开始对此做出分析，他就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时年不到40岁的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基辛格是尼克松总统的智囊团成员，他通过自己对国际政治的精确分析能力为尼克松进言献策。1969年5月，中苏又在新疆发生军事冲突。在二战后期入伍、参加过美军对德作战的基辛格在审视地图后发现：冲突发生的地点离苏联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都有几百英里。任何一个国家的指挥者都不会选择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基辛格的判断虽与美国官方的“中国好战”结论相悖，但却更接近实际。在一个个类似的判断做出后，基辛格在尼克松心目中的地位日见提升。

机场会谈

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周总理赴越吊唁。苏联方面也派出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越南吊唁，并提出与周总理会晤。9月10日，外公及政治局在苏方一再提出希望后，派周总理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其见面，史称“机场会谈”。这是1965年柯西金访华以来，双方政府首脑惟一次接触。会谈虽然没有重大的成果，但双方达成了停火、维持现状的协议。中苏边界从此确实安静了许多。

五、外公的预言

1969年，尼克松赴欧亚访问期间，也在寻找向中国传话的渠道。他知道中国

与巴基斯坦关系友好，于是在与该国总统叶海亚会谈时请他给中国领导人捎去口信，表示美国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叶海亚总统随后约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转述了尼克松的口信。大使将此消息报告国内。为中美之间传递信息的巴基斯坦渠道就此开始形成。巴基斯坦渠道与后来的罗马尼亚渠道、巴黎渠道，对于打开中美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辛格何许人也

外公的认识则更进一步。海容记得，也是在1969年，有一次外公似乎无意地向她提了一句：

“美国可能要派基辛格来中国。”

然后，他就继续埋头看起了每天那两大本《参考资料》。

须知，当时基辛格远没有像后来那样蜚声全球，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学者。所以，海容并不清楚基辛格是何方神圣，顶多了解到他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不会想到自己后来会接待此人达9次之多。

事后想来，海容认为主席一定是根据《参考资料》和其它国际文电综合考虑后得出的结论，他曾说自己的任务就是研究国际形势。其实，基辛格对国际局势的言论早已引起中方关注。查询后可发现：在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访中国前，他的名字在《人民日报》共出现27次，在外公每日必看的《参考资料》中出现的频率想必更多。由此可见，外公把美国特使人选判断为基辛格，是有资料依据的。

现在回头看看《人民日报》刊载的基辛格历年言论，是很有兴味的一件事。

基辛格大名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时间是1957年12月18日，标题是《在美国“有限核战争”叫嚷的后面》。文章告诉我们：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基辛格在他所著

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一书中，提出了所谓‘有限核战争’的口号。他主张美国在准备世界大战的同时，要积极准备‘局部战争’。”

其后，《人民日报》几乎每年都有与基辛格相关的报导。直到1971年5月26日的文章《尼克松的冷雨凄风的世界——从西方报刊舆论看美帝内外交困》中提到：

基辛格、莱尔德和罗杰斯这样的尼克松主义的鼓吹者说，（尼克松主义）是为重新使美国适应世界新的现实而作的努力。但是他们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冷雨凄风的世界。

……那座对外政策大厦，已经沉陷到越南的泥沼里了。

——美国《新闻周刊》

在所有这些报导中，基辛格都是以“反面角色”出现的。可历史恰恰选择了尼克松、基辛格等昔日的“右派”参与开启中美关系之门，外公预言的深刻之处也在于此。

“大外交”初露端倪

1958年，外公在接见我驻外大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一向所想的是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國感到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后一定会承认的。”^[1]

“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到了外公说基辛格可能来华的1969年，距离1949年已经20年了。美国方面也并非没有“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意思，中国方面是该有所行动了。

当时，中国北方边境有苏联陈兵百万，南方边境有美国燃起的越南战火。面临

腹背受敌，外公看到的是不利中的有利，是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绝佳时机，被后世称为“大外交”的惊人构想初露端倪。

一方面，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急于抽身；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日渐壮大的国力以及对国际事务不可小觑的影响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长期敌视和封锁中国的美国，终于有可能在改善两国关系方面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另一方面，中国认为美国军队如能早日撤离越南，对越南人民及周边国家人民，对整个东南亚的局势，都是有利的。外公还希望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不但打开中美关系之门，还要进一步与世界上其它重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平等交往，重新回到联合国参与重大的国际事务，最终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宏图壮志。不难想象：此举必将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从而改变世界。

因此，外公把长期以来行之有效的统一战线思想引入外交领域：世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团结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争取团结欧洲发达国家，分化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全世界最广泛的反霸权统一战线。上述思想从1969年起指导着中国外交战线，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74年，外公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将以上思想加以总结，形成“三个世界”的理论。上述外交实践，在今天看来，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大外交”。

1969年，外公、周总理及外交部部长陈毅、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老帅经过交换意见，洞悉国际局势将发生转折变化的先机，在思想上就“有必要打开中美关系”达成一致。随后，中美之间开始了微妙的试探。

“追到卫生间”传闻由来

外公的预言在1969年年底得到初步证实。

1969年12月3日，奉尼克松和基辛格指示，美国外交官在华沙设法接触中国

外交官，传达美国欲与中国会谈的最新意向。一时间此事传遍全球，版本颇多，其一居然说美国人一直把中国人追到厕所里……

这件重大而离奇的外交事件，其真相到底如何？当事人写过回忆文章，能起到澄清事实的作用，现引用一二。

那天，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翻译景志成随使馆二等秘书李举卿（一说为临时代办雷阳）应邀去华沙科学文化宫出席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他发现中美华沙会谈的美方联络秘书西蒙斯与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在说话，那个陌生人边说还边用手指着中国外交官。李、景二人不知道美国人在耍什么花招，决定活动结束后马上离开。他们当晚8时离开文化宫途中，美国人追上来了。景志成这样回忆：

当走到楼梯的一半时，西蒙斯领着那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他指着那位陌生人对介绍说：“先生，这是我们大使”。我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怕别人发现我们在说话，虽然脚步放慢了些，但并未站住。

这位被介绍是大使的人接着用波语对我说：“我是美国大使，我想会见你们代办先生。”我边走边答说：“我转达。”这时我发现李举卿已走出大门，我也加快了步伐。

美大使紧追不舍，气喘吁吁，边走边说：“最近我在华盛顿见到了尼克松总统，他说他要和中国进行重大的、具体的会谈。”这时，我们已走出了文化宫，李举卿已走得离我们很远了。

我们是最先走出来的，后面既无人跟着，街上空空荡荡，也没有行人。为了尽快甩掉美国人，我再次表示“我转达”后即急速离去。^[8]

对于“追到卫生间”，景志成有自己的理解，他说：

“据说美国国务院曾给斯托塞尔大使下达过一个绝对执行的指令，要他务必利用一切场合尽快地把美方要求恢复中美会谈的信息传递给中国人，即使追中国人到卫生间里也在所不惜。这也许是造成以讹传讹的原因吧。”^[9]

注释：

[1]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后部第5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2] 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70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

[3] 李连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老外交官回忆周恩来》第29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2月

[4].[5].[6] 中央文献研究室：《对周恩来关于苏联要求与我通话的处置意见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7] 《学习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外交战略家毛泽东》第102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8].[9] 景志成：《美国大使在华沙追我的真相》，载于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五辑第254～257页

第三章 | 1970·有朋远来

一、 斯诺其人

外公与斯诺

“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1]

忘记是在学生时代的哪一年，一本书中有关红军十七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描写让我流下了热泪。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众所周知，他是我外公毛泽东的朋友。

我很崇敬斯诺前辈。2005年夏天，我在北京大学纪念斯诺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提交了论文并做了简短发言，主题是斯诺5次采访毛泽东的新闻影响力。虽然已有前辈的很多研究成果，毛泽东与斯诺这个话题仍然远未终结——我这样认为。

比如，在1970年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与打开中美关系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斯诺已于1972年因病过早去世，未能来得及深入分析和回顾这一重大历

史事件。参与当年活动的中方知情人少之又少，文字方面未能留下多少第一手材料，真是遗憾。

海容姐姐和闻生阿姨参加了外公与斯诺的最后一次会见。无论谈外交还是谈斯诺，她们俩都是不可多得的讲述者。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向她们请教当年发生的事情，期望唤醒深藏了35年的记忆。庆幸的是，我总算部分地达到了目的。

毕竟斯诺不是外国政要，况且外公和他的谈话后来也印发全国，较之其它重大外事活动，回忆这段往事会轻松许多，所以连海容也难得地提到了一些细节。再加上与外公传记、斯诺著作的印证，以及阅读外交题材的有关书籍，我对斯诺访华及其前后的外交大事总能得出一个大概的印象了，虽然还是略嫌简单。

有趣的是，我发现各方的描述之间还存在一些误会和遗漏。也许，历史的原貌总不可能那么清晰，而在于似与不似之间。

前4次采访

在此，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斯诺其人。

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中国苏区采访的记者。三十多年来形成这样一条老规矩：外公每次与斯诺见面，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的。

1936年，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他与我外公连续几天彻夜长谈，外公由此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忆自己的前半生。我的外婆贺子珍为他们端来自己做的“甜点”腌酸杏以助谈兴。陕北之行让斯诺写出世界新闻史上的名著《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罗斯福等不少美国政要对此书赞赏有加，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开始为



斯诺拍摄的“戴八角帽的毛泽东”
(1936年，保安)

西方世界所知。

1939年，斯诺来到延安。这一次，外公托他与美国政府说明中共的对美政策，表示与美国合作的诚意。为款待贵客，外公新婚的夫人江青亲自下厨为斯诺烹制可口饭菜。回国后斯诺写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并数次向美国总统罗斯福介绍中共解放区的情况，对世人了解中国和中共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60年，斯诺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其实，斯诺早有来华的意向。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麦卡锡主义”的反共措施让斯诺处境维艰，久难成行，致使英国记者格林抢先成为第一个采访新中国的西方记者。此次访华斯诺得到了外公、总理的接见并与之长谈。他据此出版了著作《大河彼岸：今日红色中国》。

1964年底至1965年初，斯诺再次访华。美国报刊不敢对斯诺提供资助，他是以法国某刊物记



外公与斯诺交谈（1939年，延安）



外公与斯诺在中南海丰泽园门前交谈（中为马海德）（1960年，北京）



外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斯诺第四次采访（1965年，北京）

者身份来华的。斯诺与外公、总理长谈多次，得到了诸如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新闻图片、中国首次公开的内部经济数字等大量独家新闻。除美国外，全球各大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斯诺据此写成的中国报导，美国报刊则对其做摘录和改写后再予以登载。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斯诺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状况，多次提出访华申请。经总理请示外公，斯诺夫妇于1970年8月再次达成中国之行。

二、中美关系的曲折

五二〇声明

说到斯诺最后一次来华，就不能不说到1970年中方为支持柬埔寨抗美救国运动，以我外公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五二〇声明”，不能不说到打通中美关系过程中的曲折。

本来，在1969年初步接触的基础上，1970年2月20日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6次会议正式商定，下一次会议，即137次会议将是更高级别的谈判，以便讨论中美间的重大问题。

对立20年的中美两国能达成这样一个意向，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不过，大家心里都清楚，影响中美关系的变数是很多的。果然，谈判的势头不久就被打断了。

1970年3月，柬埔寨发生政变，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被宣布废黜。柬埔寨是中国近邻，西哈努克亲王一向与中国友好，而政变方则与美国关系密切。中国方面此时的想法是推迟会谈，看看事态究竟如何发展。外公在总理的报告上批示：

“可略推迟几天，以四月十五日为好，请总理酌定。”^[1]

中方看到的结果是：美国为支持政变者，于1970年4月从越南派兵侵入柬埔寨。显然，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好谈的。中方宣布：推迟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第137次会议。

1970年5月20日，外公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坚持支持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人民战争。次日，外公和西哈努克亲王登上北京天安门城楼，出席百万人参加的首都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中央副主席林彪宣读了“五二〇声明”。

“五二〇声明”传遍世界。美国总统尼克松获悉后不免对改善中美关系感到绝望。他冷静的顾问基辛格提醒道：中方基本是在重复过去的革命言辞，并未采取进一步行动。

基辛格博士说得对。的确，中国人没有把门关死。

“五二〇声明”全长不过932个字，最著名的是以下这段：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



中国领导人邀请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出席国庆观礼
(1965年，天安门)

前排左起：莫尼克、毛泽东、西哈努克（身后左为彭真、右为韩叙）、刘少奇（左为齐宗华）



外公在支持柬埔寨抗美大会上手持“五二〇声明”（1970年5月21日）



毛主席、周总理与西哈努克亲王在首都支持
世界人民反对美帝斗争大会上
(1970年5月21日)

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它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由此，“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句话成为当年权威的《毛主席语录》中最新的一条。

三、斯诺最后一次访华

天安门上

“五二〇声明”发表后不久，美军撤出柬埔寨。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斯诺是1970年8月到京的。10月1日，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国庆观礼的嘉宾。在那里，他见到了我的外公毛泽东。

斯诺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我坐在挤满了人的天安门城楼上，怡然自得，忽然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回头一看，是周恩来总理，他领着我和我的妻子洛伊斯很快站到毛主席身边……”^[3]

又是五年不见，外公与斯诺含笑而视。就在此时，总理吩咐记者拍下美国记者斯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出现在毛泽东主席身边的历史性照片。总理在旁边满意地审视着这精心安排的一幕。

此时，身为礼宾司负责人的海容也在城楼上。这天来的外宾很多，忙于照顾他们的海容，没有意识到斯诺出现的重要性。

在那样的场合接待斯诺，是外公特意安排的。耐人寻味的是，当天的新华社电讯并没有格外把笔墨放在斯诺身上，只是把他放在参加庆祝大会以及被会见人士名单的最后。放“试探气球”的机会是需要等待的。电讯称：

“在城楼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还会见了穆·阿·拉赫曼中将和夫人，马哈茂德和夫人，阿里·马福德上校，中岛健藏，松·坎万冯沙，阮文禄，斯诺和夫人，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去天安门是为了检阅国庆游行。没有人想到，这是外公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最后一次检阅游行队伍。一年后的这一个国庆节是静悄悄过去的。我外公与斯诺——这对老友很快都病倒了。

老朋友有请

在城楼上，外公和斯诺约定的是“以后再谈”。10月12日，周总理在外交部“关于毛主席接见斯诺的安排建议”上写道：

“建议在最近几天，主席接见斯诺一次。斯诺原定十月十五日外出，如主席同意在最近几天接见，也可推迟斯诺夫妇外出。主席哪天接见，是否让他夫人参加，哪些人陪见，可否照像，均请主席决定示知。”^[4]

外公在此件上批示：

“可以，拟多听他谈些国际情况。”^[5]

然而，斯诺对外公的采访并未安排在10月15日之前，其间是否发生过什么变故，我不得而知。繁杂的国事牵扯了老人家的精力，外公再次与斯诺见面已是该年冬天。

1970年12月18日，清晨5时许，天还黑着。在朝内大街外交部办公楼熟睡的海容被电话铃声惊醒了。

电话是外公的护士长吴旭君打来的，她告诉海容：

“主席马上要见斯诺，就你和唐闻生两个参加。你们告诉斯诺，一个老朋友要见他。快来！”

外公急令

海容愣了一下，她还完全没有醒过神儿来。

昨天，即12月17日中午，海容随同中央领导前往朝鲜大使馆，出席为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而举办的图片展览和电影招待会。当天晚上，她又和闻生



外公、总理与斯诺夫妇
及翻译冀朝铸在天安门上
(1970年10月1日)

阿姨一起随周总理等出席西哈努克亲王、宾努亲王为庆祝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订10周年和中柬友好协会成立10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这样的日程对那个年代的外交部工作人员来说不算繁忙。“大外交”时代的中国外交部大楼经常是灯火通明，彻夜不眠。

外公急令，海容不敢有分秒耽误。她赶快把自己的搭档唐闻生从被窝里“拽”了起来。

中南海派来的车随即到达，接王海容、唐闻生去游泳池外公住处。她们当面接受了外公布置的任务，便登车前往斯诺住地，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

为何会见斯诺

为什么外公突如其来提出会见老友斯诺？据已披露的材料及老同志的分析，是因为“大参考”（即《参考资料》）介绍了斯诺的文章。

原来，1970年12月13日，意大利《时代》周刊发表了斯诺一篇文章，



外公与斯诺交谈（1970年10月1日）



天安门前游行场面（1970年国庆节）

内容是周总理接见他的情况。新华社随即把此消息编入《参考资料》。外公得知后，立即调阅全文。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

《参考资料》是供中央高层阅读的内部刊物，很难查阅。所幸，面向全国的《参考消息》于1971年6月7日刊登了斯诺这篇文章，其中谈到：

“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文化革命’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的‘倒退’，恢复了自己同外界的联系，很明显，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声明，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①

斯诺据“五二〇声明”做出判断：中美有可能站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可是一项重大发现！虽然“反帝统一战线”的说法并不确切，但外公是否仍有觅得知音、兴奋不已的感觉呢？

清晨造访

斯诺夫妇也是12月17晚应邀出席西哈努克亲王招待会的来宾，而且在招待会中，总理告诉斯诺：毛主席近日感冒，与你的会见可能近期不能安排。于是斯诺就放心地参与其他活动去了，回到住地后又整理了一阵子材料，很晚才入睡。

海容她们赶到北京饭店，天光尚早，为了尽量少打扰斯诺，决定先打房间电话。在服务台查到号码后，闻生阿姨拨了几回，都是无人接听。无奈之下，只好敲门。斯诺住的是套间，在对着服务台的两条过道上各开一门。她们硬着头皮，分头去敲，又敲了半天。睡眼惺忪的斯诺夫人洛伊斯终于打开房门。唐闻生迎上前去，语含歉意同时也很急促地用英语告诉她：

“有一位老朋友要见斯诺先生，请他现在就跟我们走。”

洛伊斯帮斯诺找来出门穿的衣服，王海容、唐闻生陪斯诺同车前往中南海，留

下不知所到的洛伊斯一个人在北京饭店等待。海容还告诉我一则趣闻：

当时有专人负责接待斯诺。到了白天，发现斯诺不见了，问他夫人也不知道。失踪了？负责接待的人急得不行，把老先生丢了……

难得的长谈

中南海对于斯诺来说并不陌生，1960年他来过丰泽园做客。1966年8月18日，外公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斯诺是他在这里会见的第一位外宾。

很快，载着斯诺一行的车停在游泳池门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副主任张耀祠上前问候，他们是负责外公安全警卫的最高领导。斯诺从他们的军装和身份上判断，这是两位将军（汪东兴、张耀祠1955年确被授予少将军衔）。

斯诺由汪东兴、张耀祠引路，穿越长长的过道，来到一个宽敞的房间——外公的书房。时间已是7点多钟。外公坐在沙发上看报，他身穿羊绒衫、外罩睡衣，腿



外公会见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财政部长贾马勒和穆登达（1970年7月11日）。穆登达后任赞比亚外长，为1971年中国恢复联大席位做出重要贡献

上盖着毯子。

斯诺回忆道：

“他(即毛主席)有点轻度感冒，便高声说，不晓得医生干什么，连感冒那样简单的毛病也不能预防，使这么多的时间都损失掉了。我提起莱纳斯·波林医生——主席听说过这个人——他提倡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作为对付感冒的万灵药。我提出给主席送一点来。他说他将试试看。如果有效，我就有了功劳。如果使他中了毒，我也不会受到责备。”^[1]

两位老友一见面就开始了打趣。当然，这些都没有收入正式公布的谈话记录。唐闻生已全力投入了翻译，海容则张罗起斯诺的早饭——他已是65岁的老人了，又是外公和总理的贵客，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而且斯诺感到困倦，也曾向唐闻生



外公会见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鲁巴伊（1970年8月11日）



外公会见苏丹民主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尼迈里将军（1970年8月12日）

外公会见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将军（1970年11月13日）



提出，是否可以找一点提神的咖啡。

海容经过一番张罗，请工作人员找到了几片面包。又派人去西单居然买到了速溶咖啡。海容想这样也能凑合交差了，毕竟西餐和外公的饮食习惯差距太大，这里不会预备更多适合斯诺先生吃的东西了。

就这样，大记者斯诺一边就着面包，喝着咖啡，一边进行着对我外公的第五次采访。此时海容也已落座，开始记录这次对中美关系有重大影响的谈话。

这次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海容和闻生阿姨记得，只在中间为每人提供过一杯鸡汤，是用喝饮料的玻璃杯装的，其中各有一支鸡翅。这个玻璃杯用得特别，她们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此外就没有别的吃的了，事后也没有在主席处用午餐。的确是终生难忘的一天。

斯诺刊登在1971年第四期美国《生活》杂志上的文章对外公的书房做过如下描述：

“毛的宽敞的书房里四面都是书架，上面摆满了数以百计的中文书籍，也有少量的外文书。许多书中夹着纸条，作为注释书签之用。大写字桌上高高地堆着报刊和手稿。这是一位正在从事写作的作家的工作室。通过宽阔的窗户，可以瞥见园

中的景色，据说主席在园子里种自己的菜，并搞农作物试验……”^[8]

12月18日的这次谈话，风格一如此前4次，可谓“大南海北”，“海阔天空”。话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个人崇拜、尼克松、中美关系、对“文革”的评价和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其中最多最重要的，当推中美关系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谈话从早晨8点多开始，直到午后1点，将近5个小时。这是外公晚年谈话最长的一次。

石破天惊

外公与斯诺的谈话给海容留下最深印象的内容是：

“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地少一点。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9]

斯诺听到这番话，大为惊讶。他明白，自己的老朋友毛泽东希望把这些话带给尼克松。斯诺这样做了。

外公进而说到：

“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

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10]

于是两位老朋友就此展开了讨论（以下外公简称为“毛”斯诺简称为“斯”）：

斯：有一两件事想跟你探讨一下。第一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访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

毛：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

斯：当然，我也刚要这么说。

毛：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也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得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他选举是哪一年？



当年的会谈地点
北京饭店今貌

斯：一九七二年。

毛：一九七二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台湾是杜鲁门、艾奇逊搞成这样的，然后又是一个总统，那个里面他也有一份就是了。然后又是肯尼迪。尼克松当过副总统，他那时跑过台湾。他说台湾有一千多万人。我说亚洲有十二亿人，非洲有三亿人，都在那里造反。

斯：你看中美会不会建交？

毛：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关于个人崇拜

那次会见给海容留下又一深刻印象的，就是听到外公表示对“文革”中盛行的个人崇拜提法的不满。比如他这样评论由林彪带头搞起来的“四个伟大”：

毛：那个时候[编注：1965年]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



外公由乔冠华、龚澎夫妇陪同在京会见斯诺（1965年）

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 Great Leader Great SupremeCommander Great Helmsman”[原注：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斯：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

毛：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

斯：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
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斯：听说进城前夕开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曾经通过一项决议，禁止用党的领导人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山村等。

毛：这个现在都没有，没有什么用人名来命名的街道、城市、地方，但是他搞



外公在颐年堂会见外国友人斯诺、艾黎和马海德，左一龚澎（1960年10月22日）



外公在家宴请斯诺时谈笑风生



刘少奇与斯诺交谈，外公在旁倾听
(1960年10月)

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标语、画像、石膏像。就是这几年搞的，红卫兵一闹、一冲，他不搞不行，你不搞啊？说你反毛，anti-Mao！^[12]

.....

最后一面

然而在座的包括斯诺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这不仅是他最后一次来华，也是我外公最后一次与朋友之间的长时间畅谈——

毛：你到处跑跑嘛，在美国、欧洲、中国之间到处跑跑。以后你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美国，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欧洲，三分之一的时间住在中国，到处都住住，四海为家嘛。

斯：不过我还得要工作呢。

毛：我看研究美国，研究中国，研究欧洲就是工作。

斯：我会努力的，但是结果如何还难说。

.....

斯：关于文化革命的问题，今天你是不是回答完了呢？

毛：“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回答了一部分。你明年再来吧。你如果愿意的话，欢迎你来。^[13]

看来，外公还期待着再次与斯诺畅谈，接受他的第六次采访……

在老友见面的同时，癌细胞已在斯诺体内生长，只是他没有察觉。他患的是肝癌，病情发展很快，半年后卧床不起。埃德加·斯诺于1972年2月16日在瑞士家中去世。此前，外公和总理派去医疗组，尽最大努力减轻他的痛苦。远方老友的关怀让斯诺含笑而逝。



周总理与斯诺在密云水库交谈（1960年）

中国失去了一位外国朋友，外公失去了一位能交心的朋友。

据斯诺夫人洛伊斯回忆：斯诺回到北京饭店住地，自己拉住他询问究竟，桌上烟灰缸里全是她等待期间吸剩的烟头。她拿出录音机，“逼”着丈夫把能回忆起来的段落口述一遍。之后，两个人都筋疲力尽，倒头便睡。

美国人民是朋友

从游泳池出来，王海容、唐闻生马上去了国务院老会议厅。总理管外事，必须向他汇报。

总理在听完她们的汇报后，才知道外公刚才会见了斯诺。在他的精心安排下，7天后，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则消息，还配发了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外公与斯诺的合影。这天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选用的则是：

“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下面讲讲谈话记录的情况。

唐闻生负责整理谈话的英文记录。根据斯诺的请求，经请示总理，由外交部领导审阅后，给了他一份。斯诺结合自己记录下的那部分内容，把谈话整理成文，于1971年4月发表在美国《生活》周刊上。

当然，如果斯诺能早一些于1971年年初就发表该文，其影响还会大得多。

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共同整理的中文记录，经外公和总理审阅后，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至全国每个党支部，并要求党员认真学习领会。这个记录，对中国人民理解中央打通中美关系的决策，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外公会见外宾后，与总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工作人员合影



注释：

- [1]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斯诺文集》第二卷第178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
- [2]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8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 [3] 埃德加·斯诺著，胡为雄译：《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第165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
- [4]、[5]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 [6]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20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月
- [7]、[8] 埃德加·斯诺著，胡为雄译：《漫长的革命——紫禁城上话中国》第166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9月
- [9]、[10]、[11]、[12]、[13]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163—1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第四章 | 1971·小球大球

一、两条新闻所引起的

2005年5月，一则消息的标题引起了我的注意：

基辛格访问北大，也许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

1971年，基辛格博士在担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间，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是缓和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2005年的这次访华，对基辛格来说大概是第四十次了。

82岁的基辛格满头银发，眉毛也花白了。他在北京大学说：“我已经到了人生的晚年，这次也许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了。希望中美两个大国的友好关系永远保持下去。”

对每一个学习过国际政治的人而言，基辛格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查阅资料后发现：从1971年至1975年，基辛格9次访问中国的接待者中有一个人——王海容始终在场。何况，基辛格首次访华，就是章文晋与王海容、唐闻生等人秘赴巴基斯坦把他接来的。这中间又有多少故事！

2005年还有一件炒得沸沸扬扬的国际新闻，那就是日本等国争取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事。

这倒让我想起了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重大事件。从1949年开始，拥有数亿人口和近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竟被长期排斥于联合国这一世界大家庭之外，实在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件憾事。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当时又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

海容其人，恰恰就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的副代表之一，亲历了联合国各成员国欢迎中国的空前盛况。在美国，我也到联合国总部参观过。结合自己的感受，我又向她提出了问题。

二、美国队访华

要求访华

1971年4月30日，斯诺的文章《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终于刊登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外公邀请尼克松访华的石破天惊之语首次面世。然而此时，全世界的注意力已被一场在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展开的无形乒乓球赛所吸引。

1971年3月2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再未参加国际赛事。这次重返国际体坛，也是在外公和总理的决策下，克服国内国际重重阻力才实现的。只不过当时连他们也没想到，这次比赛会催生出如此有利于中美关系改善的成果。

在日本，美国队提出访华要求。消息传回北京，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上交总理，认为目前邀请美国队的机会尚不成熟。4月4日，总理在报告上面批注“拟同意”后呈报外公。

4月6日，外公圈阅报告，退外交部办理。美国乒乓球队无缘来华似成定局。因为4月7日世乒赛就闭幕了，各国代表团将陆续回国。

发生转机

然而，已成定局的事情，转瞬间却发生了180°的大转弯。

事情的起因，源于4月4日中美两国乒乓球手的一次偶遇：美国队员科恩不知怎么登上了中国队的车，中国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致意并赠送礼品……我从外公的护士长吴旭君阿姨那里得知，当其为外公念《参考资料》有关此事的报导时，老人眼睛一亮，不但让她把这则花絮再念一遍，还说了一句：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海容也知道外公这句话。虽



外公会见乒乓球国手（1962年）

左一傅其芳教练、右四容国团教练、右三庄则栋，与外公握手者为邱钟惠



总理会见参加第26届世乒赛中国选手，与总理敬酒者为庄则栋，左一徐寅生（1962年）

然，庄则栋后来一直在干他的老本行体育，并未涉足外交，但是，这位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对于中美接触所做的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外公读报（1966年）

几则外电

连续几天的几则外电（引自熊向晖

《“乒乓外交”史话》），比较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中美乒乓球队员接触后给外界带来的巨大震动，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外公会突然转而做出邀请美国队访华的决定：

第一则：

共同社消息《以庄则栋为中心，形成了“友好之环”》

.....

科恩向结束了比赛的庄则栋打招呼，把他带到记者接见室，握着他的手说：“真多谢你了！”作为回礼，他拿出一件睡衣，旁边陪同的一个中国代表团官员，拉了拉庄的袖子，但是，庄则栋却没有理会，微笑地接受了他的礼物说：“美中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我很愿意加深个人之间的友好。”

.....

和庄则栋分手以后，科恩说：“中国人是好人，我也想到中国去看看，但是人家没有邀请，大概去不了吧！”

第二则：

共同社报道《“一起乘车吧”——世乒赛上的“美中友好”》

.....

上午10点左右，在体育馆附近体育会馆前结束了练习的中国选手正要上车，

这时候，穿着印有“USA”字样运动服的科恩选手，正急急忙忙经过汽车旁边步行到体育馆去。中国选手看见了他，就打着手势对他说，“要是去体育馆就座车去吧！”

对于这种出乎意料的邀请，科恩选手开始有些诧异，但后来却被面带微笑招手示意的中国选手吸引过去，上了汽车，向距那里数百米左右的比赛地点爱知县体育馆驰去。

.....

到了体育馆之后，穿着流行服装的科恩选手和穿着鲜红色运动服的中国选手在大门前面一起拍照留念。因门票卖光而进不去体育馆的观众，见到了这种情景，都热烈地欢呼、鼓掌。

.....



庄则栋与科恩互赠礼物
(1971年，名古屋)

第三则：

美联社报道《我运动员和美国运动员科恩进行一次友好活动》

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共产党中国人，昨天招呼一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搭乘他们的汽车，并向他赠送了一件礼物。这位美国人向中国一位冠军回赠了礼物——一件带有和平标志的短袖衫。

格伦·科恩（19岁）透露说，他把这件短袖衫送给庄则栋以前，还在上面别上了美国代表团的纪念章。

庄则栋说：“谢谢，谢谢。”并同这位美国人握了手。

庄则栋对记者说：“收到美国代表队队员的礼物，我感到高兴。”

.....

科恩说：“多年来，我一直很崇拜庄则栋。”但是他说，他没有对中国运动员讲这一点。^[1]

外公改变决策

为了探究外公在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问题上的转变过程，2005年年底外公诞辰112周年之际，我专门请教了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她同我谈起那天的情况：

4月6日晚上，外公提前吃了安眠药，打算睡觉。11时多，吴旭君陪同他吃晚饭。饭后，发现老人已经困倦，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突然，他又说起话来。吴旭君听了一会儿才听出，大意是：

“打电话——王海容——美国队——访华！”

吃安眠药后讲的话不算数。这是外公的嘱咐，也是中央定的一条规矩。如此重大的事情，外公当天又刚刚圈阅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吴旭君是知道的。她不敢做主。

“怎么办？我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吴旭君说。

看她没动静，外公生气了：

“小吴，你怎么还不办？”

吴旭君故意说自己刚才在吃饭，没听清。外公信以为真，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这回听清楚了，真是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吴旭君还是不放心的，问外公吃安眠药后说的话算不算数。外公急了，一挥手，说：

“算！赶快办，来不及了！”

接到吴旭君电话，海容第一个反应：报告总理！《周恩来年谱》载明：

“[1971年4月7日]

本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2]

1972年7月24日，外公在一次与总理等人谈中德建交问题时，提到了临时决定“接球”一事。他说：

“那个文件[注：即不邀请美国队的报告]，我本来也是看了的，画了圈。后来到了晚上，考虑到还是要请，就叫打电话。结果那边他们也是没有准备，就去请示东京的大使馆，马上发护照，就来了。”^[3]

8日，接待美国乒乓球队的请示报了上来，总理兴奋地在上面批注：



外公打乒乓球（1963年，上海）

“(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4]

总理巧布坐席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世界舆论为之瞩目。

4月14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加拿大、英格兰、哥伦比亚、尼日利亚及美国共5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成员。总理为安排座席煞费苦心,海容对此记忆犹新。

美国代表团无疑是这5个国家代表团中最受世人关注的。而如何把握代表团之间,国与国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不使每个代表团有失落和充当陪衬之感,则需要高超的外交艺术。总理提出一种全新的座席安排方案,即在每个代表团中间设置主座,总理谈完一处,再去下一处继续谈。这样一来,等于既集体会见了5个代表团,又逐一会见了每个代表团,而且还与每个代表团逐一合影,客人皆大欢喜。

用现在的话说,这是非常人性化的设计。总理这样设身处地为客人考虑,平等待人,不辞辛苦地抓住每一个交流沟通的机会,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启示。

小球与大球

总理向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谈话时指出:

“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5]

与周总理1971年4月14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发表了有助

于改善中美关系的5项具体措施：

“在考虑了后来进行的研究和提出的建议后，我决定采取以下措施，这些措施都不需要制定新的法律，也不需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

——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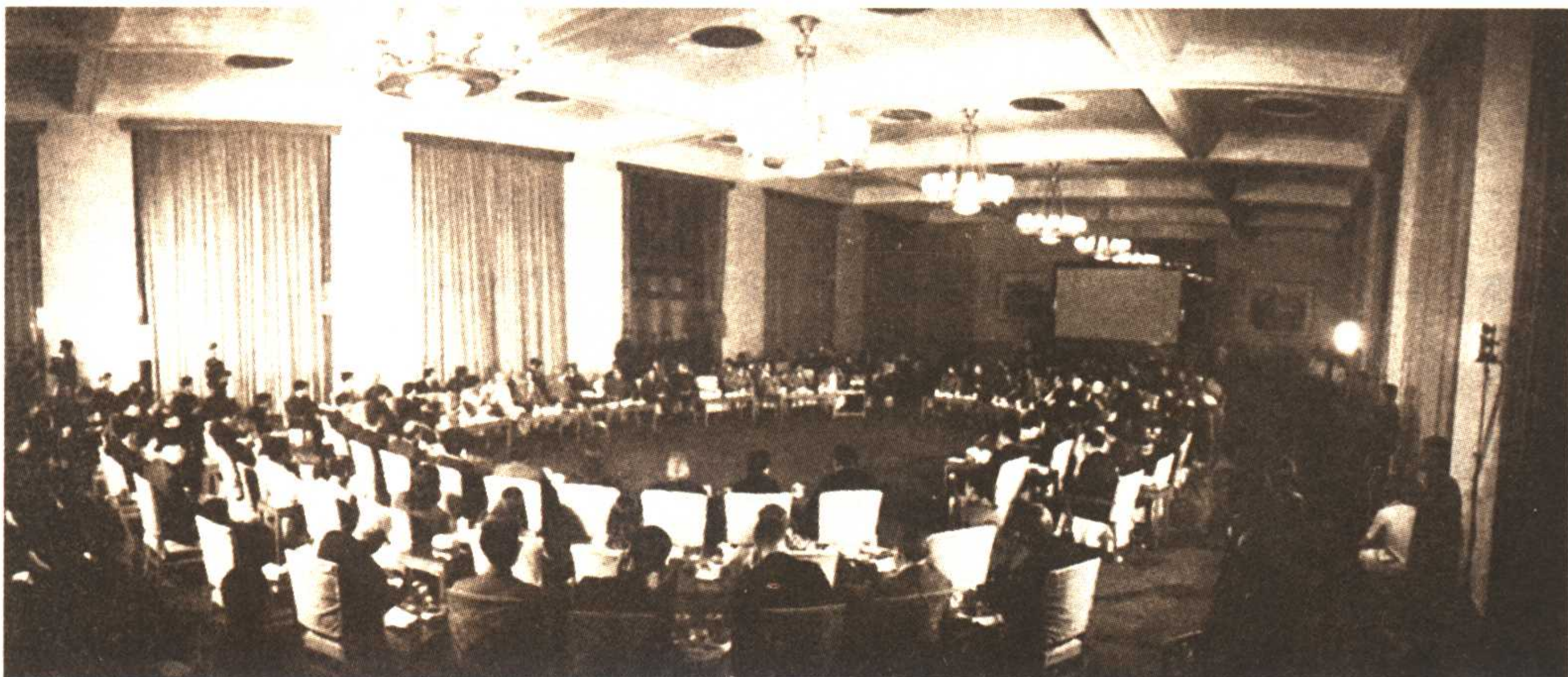
——将放宽美国货币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



初到中国的美国队员准备拍照（1971年，深圳）



美国队员在长城合影（前跪坐者为科恩）（1971年4月）



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5个国家的乒乓球代表团（1971年4月14日）



总理与美国队领队哈里森握手（1971年4月）



总理与美国队队员科恩握手（1971年4月）



总理与美国队谈话（1971年4月）



总理与美国队合影（1971年4月）

——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员或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但前往或来自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中国拥有或中国租用的运输工具除外；

——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前往中国的港口；

——我已要求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我研究和批准这个清单上的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6]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充当了两国之间的民间外交特使。小小银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二十多年的国门，震动了地球。国际舆论将此称为“乒乓外交”。

三、基辛格访华

入住钓鱼台

随着中美关系发展步伐的加快，接待美国特使工作提上日程。有关接待人员于1971年夏天入住钓鱼台四号楼，紧锣密鼓开始准备。

有关方面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翻译、联络人员、记录、服务人员、司机和安全人员均做出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

1971年7月，中美商定，美国派总统特使基辛格转道巴基斯坦来华。周总理决定，由外交部派出接待小组，成员分别是：

章文晋，欧美司司长。建国前与美国军调处人员有过接触，后任驻美大使。

王海容，礼宾司副司长。此前接待过美国作家斯诺，与美国官员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唐龙彬，礼宾司干部。懂外语，后任驻瑞典大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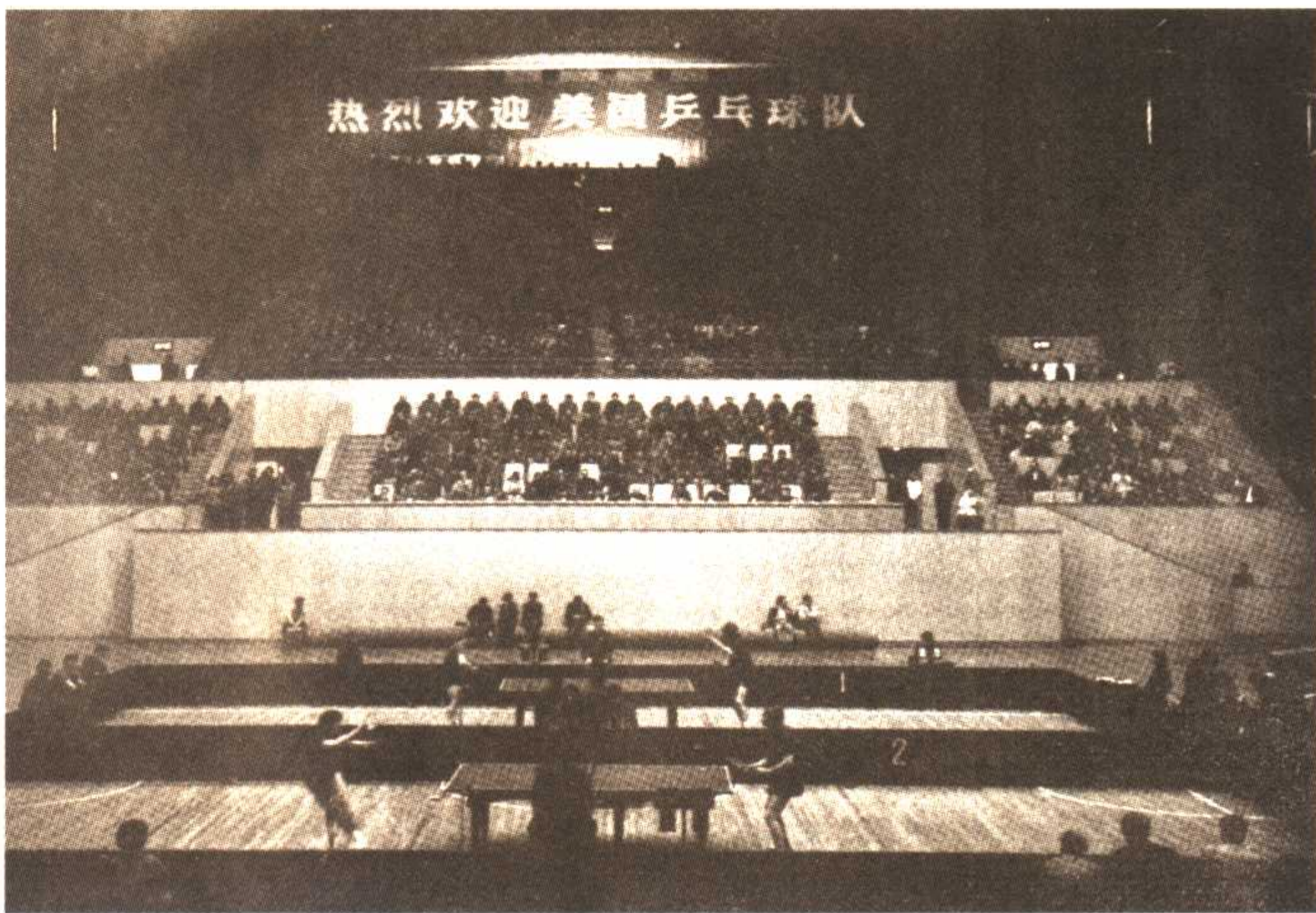
唐闻生，英文翻译。欧美司科员，生于美国。

秘赴巴基斯坦

1971年7月9日上午，接待小组一行到达北京南苑机场。没有什么送别仪式。机场招待了一顿午饭后，他们登上专机，同行者还有中国民航驾驶员徐柏龄等。现在看来那只是架中型飞机，但当时国内的飞机普遍都很小，海容觉得这架已经很大



周总理打乒乓球



中美乒乓球友谊赛（1971年4月）

了。大家聊聊天，看看材料，休息休息，飞行共需4个多小时。

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后，中国大使张彤在机场上等候。接待小组住进使馆，讨论工作，分析动态，与国内保持联系，随时听候指示。天黑之后，接待小组由使馆安排出来散步。

中国使馆建在郊区山上，能鸟瞰全城。这是海容生平第一次出国。执行如此绝密的任务，在海容来说应该也是第一次。不知不觉间，海容和他的父亲王德恒烈士之间有了某种相似性。不过，比起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王德恒，海容此行是一个紧密的小组，背靠祖国，她未感紧张。

巴基斯坦天气比中国要热很多。次日晚上，张彤大使和接待小组应叶海亚总统邀请赴宴。叶海亚对为中美“牵线搭桥”感到荣幸，章文晋代表中方致谢。主人考虑得很周到，为海容这个湖南妹子准备了一碗巴基斯坦小辣椒，辣得她浑身冒汗。本来就已挥汗如雨，这下更是湿了个透，不过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罗马尼亚渠道是中美又一秘密联络方式。图为外公会见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一行（1971年6月3日）

初见基辛格

第二天，海容一行仍然留在使馆。第三天，7月11日清早，中方接待小组和美国特使分别乘车前往机场。美方正式人员共有4位，他们分别是：

亨利·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约翰·霍尔德里奇，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资深外交官。

温斯顿·洛德，基辛格特别助理。

迪克·斯迈泽，美国东南亚问题专家，职业外交官。

还有非正式人员3位，分别是：

雷迪，特工人员。

麦克劳德，特工人员。

朱莉·皮诺（女），秘书。

中国接待小组从北京出发，美国特使一行从印度出发，双方在同一天抵达伊斯兰堡。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人是秘密的，美国人是公开的。基辛格假称腹痛，骗过在伊斯兰堡的所有记者，利用两天48小时“养病”的时间去了中国。

双方终于落座，面对面。外公两年前的预言变成现实，基辛格就坐在离海容咫尺

尺之遥的位置。

20年来，中美之间有着太多的隔阂和敌意。朝鲜停战谈判，双方曾经一言不发，互相怒视，1小时后散会；华沙大使级谈判，双方代表面带严霜，照本宣科后扬长而去也是常事。如今，经过这么多的曲折，双方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坐到一起，双方反映又该如何呢？

对于接待小组来说，基辛格是客人，中方总要有个主人的样子。行前总理当着海容的面给章文晋做过交代——

“谨慎不多言是好的，可是要注意场合和需要。这次去接基辛格，你是主人要主动些，不要使从未到过中国的客人觉得太冷淡了。”

美国特使基辛格秘访中国，这个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迹在中美共同发表公告前，一直被成功地严格保密着。不过也有这样一则趣闻说明有意外发生，它从侧面反映出世人对打通中美关系的看法，非常耐人寻味。

据说，基辛格凌晨登上飞机的那一刻，同在机场的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

斯坦特约记者贝格一下子认出了他。随即，贝格从机场负责人那里得到确认。他马上赶出一条急电，把这条特大独家新闻发给报社：

“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七月九日凌晨四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7]



外公与叶海亚宾主欢谈（1970年10月）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机场迎接基辛格博士。左起：王海容、冀朝铸、叶剑英、黄华、基辛格、章文晋（1971年7月9日）

这条本可提前震动世界的新闻最后下场是被编辑视为废稿扔在一旁。他们实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基辛格去中国！他不要命了吗？^[8]

北京 48 小时

根据中美之间的商定，基辛格此行要在北京停留两天即48小时。在当时的条件下，美国方面是无法与特使取得任何联络的。尼克松总统给予自己的全权信任使基辛格底气十足，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即将来到神秘陌生的中国，基辛格那全球

新闻界熟知的笑容竟一时难以展现。

1971年7月11日中午，接待小组及美国特使一行抵达北京南苑机场，这里位于北京南郊，作为军用机场，保密性优于常有飞机起落和人员来往的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和西郊机场。

中方人员已在机场等候，他们是——

叶剑英，军委副主席（1966年至当时）。

黄 华，即将担任驻加拿大大使（1971年7月赴任），他是最后一位与美国驻华大使打过交道的中国官员。

熊向晖，前驻英代办，此次担任周恩来总理助理。

韩 叙，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

冀朝铸，外交部翻译，童年及青少年时代在美国度过，担任周总理的翻译。

午饭结束后，基辛格一行匆匆聚集到花园，一边散步一边讨论会谈方案。截止目前，事情进行还算顺利。不过，真正的重要时刻还没开始——下午3点，中国总理周恩来将与美国特使基辛格见面，他们的会谈将决定此行的成败。

总理与基辛格的会谈在钓鱼台开始时，海容引导美方代表在桌旁落座，她匆匆的身影留在了当时拍下的纪录片中。据统计，基辛格在北京停留的48小时中，与周恩来的会谈长达17个小时。

7月11日中午，48小时之后，美国特使基辛格一行6人离开北京。此前包括海容在内的接待小组成员都出席了欢送基辛格的宴会，叶剑英主持宴会。在他的提议下主客同时举杯，祝贺隔绝二十多年后的相会。

基辛格又出现在巴基斯坦，就像这两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然而，一篇全文加标点在内共170个字的公告已经形成，这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篇奇文。5天后的7月16日。中国《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右下角发表了这篇公告，尼克松则在全



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握手。这是 25 年来中美高层官员首次握手。(1971 年 7 月 9 日)



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交谈 (1971 年 7 月 9 日)



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会谈（1971年7月）



与基辛格博士会谈时的总理、叶帅（1971年7月）



基辛格博士在黄华、熊向晖、王冶秋陪同下参观故宫（1971年7月）



周总理设宴欢送基辛格博士（1971年7月11日）

左起：洛德（戴眼镜者）、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斯迈泽、熊向晖、王海容、叶剑英、冀朝铸、周恩来、唐闻生、黄华等

国电视广播中宣读了这篇公告。世界为之震惊。中文本内容如下：

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总理越朝之行

翻开《周恩来年谱》，会查到这样一条记载：

“[1971年7月13日]

下午，飞往河内。本日和次日，同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7月15日，赴朝鲜通报与基辛格会谈情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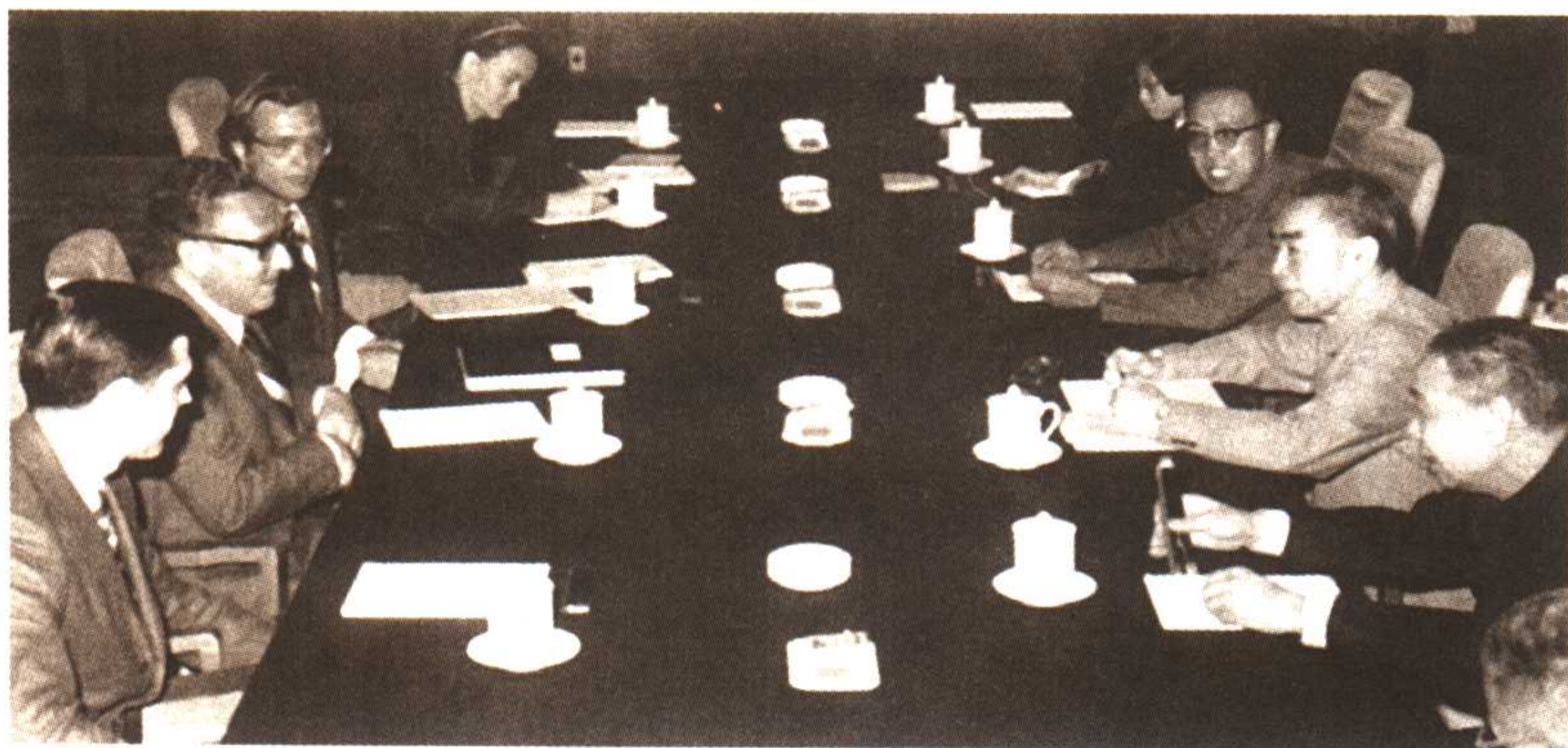
基辛格走后，中美公告发表之前，总理对越南和朝鲜进行秘密访问，通报情况，章文晋与海容等随行。给海容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越南那一天突变的天气。

7月14日，周总理和越共总书记黎笋、总理范文同会谈后，中午难得睡了个午觉。海容则负责与机场联系，总理休息后就要赶回国内。偏偏午间雷鸣电闪，大雨倾盆，看来无法成行，强行起飞非常危险。所幸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雷停雨歇后，总理顺利返回北京。

总统访华前的准备

1971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也是第一次公开访华。

这次访问将尼克松访华的确切日期定在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这样



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华
与周总理会谈
(1971年10月)

一来，准备时间就只有4个多月了。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未与美国建交的国家。

随同尼克松访华的代表团人数定为354人——据说这只是美方原先提出数字的一半。为这样一个庞大代表团提供礼宾服务，是建国以来从未遇到过的，何况还是长期与之处于不正常状态的美国总统访华代表团。可想而知，中方将面临多大的挑战。

四、联合国之行

第26届联大前的中国外交

1971年10月，中国在第26届联大期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迄今将近35年了。这一重大外交胜利看似突如其来，实际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中国外交政策经过外公和总理的及时调整，其生命力开始显现出来。1971年，中国与尼日利亚、科威特、喀麦隆、奥地利、圣马力诺、塞拉勒窝内、土耳其、伊朗、比利时、秘鲁、黎巴嫩、卢旺达、塞内加尔、冰岛、塞浦路斯共计15个国家建交，是建国22年来建交国最多的一年。截至1971年底，中国先后与世界76个国家建立过外交关系。有趣的是：第26届联大赞成中国恢复合法席位的票数也是76张。



周恩来总理迎接金日成主席（1971年）



外公会见越南黎笋（中）、范文同（1973年）

辛勤的耕耘，换来丰硕的收获。新中国在国际上朋友越来越多，成为世界舞台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这背后的意义，在外公看来，应该不亚于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下吧？

来自纽约的好消息

10月20日，基辛格一行到达北京。同一天，第26届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开始讨论和表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当晚9时许，外公约见总理及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等人，讨论联大问题。

外公说：

“联合国的表决不会那样晚。美

国是‘计算机的国家’，他们是算好了

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的那一天或者第二天，联合国就会表决通过美国的两个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所以，还是那句老话：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令人欣喜的是，10月26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提案被否决的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贺电，他还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大的后半部分会议。

10月27日晚上，总理召集外交部领导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是否出席联大，以及是派先遣队探路，还是派代表团开会的问题。海容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通知，她随即向总理报告：

“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总理率大家到游泳池后，外公当场拍板：中国派团出席联大。不是几个人去探路，而是一批人去开会。

外公拿起联大对恢复中国席位提案的表决情况，一面看，一面说：

“131个会员国，赞成票一共76，17票弃权，反对票只有35。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有道理了。”

“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莫忘朋友

从10月25日中国获悉恢复联合国席位，到11月2日外公决定派团参加联大，正好过了一周；从11月2日代表团组建，到11月9日代表团出发，又是7天。

这次准备工作不同寻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上一次踏上美国国土，还是1950年赴安理会申诉朝鲜问题。中方在美国没有任何外交机构，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还有一件事，是行前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感谢为恢复中国席位做出贡献的“两阿提案”23个提案国。11月3日晚，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为此举行宴会，包括苏联在内投票赞成提案的国家使节应邀到会。海容作为赴联大代表团副代表，与其他代表团领导出席了这次宴会。

原来，10月25日获悉席位恢复后，外交部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一时忽

略了感谢提案发起国和赞成国。总理发现后，指令有关部门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向发起国政府发去感谢电。“这一课”上得很有必要。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帮助过自己的朋友。人和人是这样，国与国又何尝不是呢？

总理送行

11月8日晚，外公召见中国出席第26届联大代表团的负责同志，总理和姬鹏飞代外长作陪。参加会见的包括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邢松鹤、王海容等。

那天外公兴致很高，把“林彪倒台”和“恢复联合国席位”列为中国在1971年的两大胜利。外公提出，代表团离京时要高规格机场欢送，政治局委员全体出席。海容记得，他还激励代表团成员说：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忙碌的准备工作一直进行到出发当天的凌晨。1971年11月9日上午9时，代表团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各界代表四千多人已等候在此，准备举行隆重欢送仪式。



周总理率政治局成员到机场欢送中国赴联大代表团（1971年10月）



中国赴联大代表团与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合影（1971年10月）

在外公做出“规格似宜高一点”批示后，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除年老多病者外，几乎全体到机场，他们是：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组成这样的阵容欢送一个由外交部副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建国以来未曾有过。由总理亲自欢送，在海容一生中也是唯一一次。

团长乔冠华及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向挥动花束、彩带、敲锣打鼓的群众和前来送行的各方面负责人告别。总理及代表团成员还特别同前来送行的柬埔寨、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使节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做的努力。周总理在飞机前和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在总理的带领下，在北京初冬的寒风中，中央领导依然不断挥手致意。飞机升空后，地面上的欢送人群才逐渐散去。代表团成员激动地看着窗外，许久之后才在各自位置上安顿下来，大家毕生难忘今天这个时刻。

这一天难忘的还有一件事，代表团成员的亲属都来机场送行。海容记得，自己4岁的小侄子也来了，还找到一个小伙伴，在机场玩得很开心。

中午飞机到达虹桥机场。那天刚刚下过一场小雨，机场的空气十分清新。参照北京的规格，上海市的负责人几乎全数出动来此迎接，并摆下螃蟹宴送行。江南秋高蟹肥，正是品尝公蟹的最好时机。

在上海只是短暂停留，每个人都紧张而激动。随后，大家登机，海容等代表团领导在头等舱落座。下一站就要离开祖国了！

初到纽约

专机在飞往法国巴黎的路上，途经在缅甸的仰光、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埃及的开罗和希腊的雅典。四国政府均派人到机场，向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致意！

11月10日，代表团到达巴黎。为早日参加会议，只作短暂停留。11月11日乘坐法航飞机，经过7个多小时的飞行，到达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纽约。

来迎接的有新闻媒体记者，以及联合国总部的礼宾司官员和阿尔巴尼亚等二十多个友好国家的使节。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准备好的书面讲话。讲话经外公审阅，言简意赅，表明了中方此行所怀的良好意愿。讲话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高兴地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我们对前来欢迎的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各个国家的代表和各方面的朋友们，深表谢意。

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我们代表团将遵循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

纽约机场欢迎仪式结束后，代表团随即前往由先遣队准备好的下榻饭店——罗

斯福饭店14层。

代表团的所有人，除了乔冠华（1950年11月赴联合国安理会陈述朝鲜战争情况）和熊向晖（1947年至1949年赴美留学）、唐明照（美共中国局书记）、唐闻生（1943年至1952年在美出生并度过童年），都是第一次到美国。一切都那样陌生。

外国记者的追踪

中国代表团在纽约的驻地是罗斯福旅馆，这是一家很有名气的中上等旅馆。房间是中国3名先遣人员在罗马尼亚驻美使馆帮助下订到的。据说，在联大开会期间，纽约的旅馆几乎客满为患。能在两周之内为这么多人订到房间，简直是个奇迹。“出门靠朋友”，中国这句古话确有道理，对人生地不熟的中国代表团来说更是如此。

这次联合国之行，外国记者的追踪本领给人印象深刻。在巴黎，记者驱车追赶中国代表团车队，在寒风中拍照、摄像；在纽约，代表团第一次去专用餐厅就餐的时候，记者早已在走廊里等候，他们“夹道欢迎”中国代表，话筒伸得老长。对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性事件，外国记者不遗余力做了报导。

不管如何，中国代表团成员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联合国“中国日”

11月15日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在联合国礼宾司负责人的带领下，步入联合国会议厅。

大会于上午10时30分开始。第26届联大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主席致辞后，是全球各地区代表致欢迎辞：科威特代表亚洲，捷克斯洛伐克代表东欧，荷兰代表西欧，丹麦代表北欧，摩洛哥代表阿拉伯世界，先后致辞。

21年来，一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美国，其驻联合国大使

乔治·布什以东道主身份上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

本来，在美国代表东道国致辞后，按照原有安排，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议程已告一段落。但是，会场上热烈的气氛促使大会主持者改变只允许各地区代表发言的安排，各国代表开始不受限制地接连上台发言。阿尔巴尼亚、法国、阿尔及利亚、智利、布隆迪、哥斯达黎加、赞比亚、古巴……这些提案国或投票赞成国代表在发言中热烈祝贺中国代表团，祝贺中国重返国际社会。

21年来一直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但在近10年来与中国关系渐趋恶化的苏联及东欧各国，其驻联合国使节也纷纷上台致辞，祝贺中国代表团。特别是，为体现友好，匈牙利代表是用汉语致辞的。

祝贺中国代表团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发言一直持续到下午6时，共有57个国家代表发言。本来当天原定召开世界裁军会议，但却成为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日。



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1971年11月）
前排左起：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代表符浩
后排：左起翻译唐闻生、代表熊向晖、陈楚

中国的声音

下午6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的发言时间到了。这次发言，是中国首次面向全世界各国代表阐述中国对世界重大问题的立场。七八千字的发言稿由外交部主持起草，经总理反复修改，呈外公最终定稿，集中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者的思想。

乔冠华团长向联合国各成员国对中国代表团为时一天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说：

“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主席先生和许多国家的代表对我们表示的欢迎。

许多朋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对中国人民的信任、鼓励和兄弟般的情谊，这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将把这些转达给全体中国人民。”

“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在人类历史上，二十六年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这个期间，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五十一个，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个。在新增加的八十一个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二十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兴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潮流。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正在联合起来，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争取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事务的权利和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没有经济上的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是不完全的。亚、非、拉国家在经济上的落后，是帝国主义的掠夺造成的。反对经济掠夺，保护国家资源，是独立国家不可剥夺的主权。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

中国与绝大多数亚、非、拉国家一样，是属于第三世界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国家和人民带头兴起的捍卫二百海里领海权、保护本国资源的斗争，坚决支持亚、非、拉石油输出国以及其他各种区域性和专业性组织展开的维护民族权益、反对经济掠夺的斗争。”

“我们一贯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我们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我们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在中国代表团团长发言期间，各国代表聚精会神倾听。发言结束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随即，几十个国家的代表走到讲台前与乔冠华握手，这在联大历史上是空前的。据代表团工作人员、资深翻译过家鼎回忆：中国代表团事先准备好的300份团长发言英文本和法文本被一抢而空，翻译只得回旅馆重新打印，继续散发。^[10]

1971年11月15日，这一天实际上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中国日。

繁忙的外交

在纽约期间，海容作为中国代表团副代表，随同团长乔冠华、副团长黄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和一些委员会会议，并先后分别拜会了许多友好国家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或常驻联合国代表，并且

会见了美国朋友和旅居美国的侨胞。

在所拜会的友好国家代表团中，伊朗代表团团长阿什拉芙公主对中国朋友格外热情。原来，她在1965年第二次亚非会议期间结识了周总理，1971年4月刚刚访问过中国。伊朗公主访华时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海容作为接待者至今历历在目，对此我会在后面章节讲述。

12小时的时差加上十二分的忙碌，中国代表团成员个个很辛苦。可是经验教训告诉大家，万万不可在公开场合犯困打瞌睡，记者坐在联合国各会场内两侧阁楼上，他们的镜头会对准会场上的任何人物，而被拍照者则无法察觉。当长篇大论让人昏昏欲睡时，最好的办法是离席出去走走，这是联合国的惯例。



周总理率政治局成员欢迎中国赴联大代表团归来

“中国胃”的烦恼

在纽约度过的37天里，还有一件事让代表团同仁很是头疼，那就是——吃。尤其是海容，她基本不吃西餐。

在美方每天提供的自助餐中，并非没有受中国人欢迎的饮食，比如早餐时每人一小杯橘汁，很是鲜美开胃。美国盛产柑橘，橘汁很常见，在当时中国则不易喝到。可在主食方面，中美两国的差距是比较大的。时间长了，大家的“中国胃”有苦不堪言之感。据亚非司女干部李松龄回忆：美国人会在正餐时提供一大块长方形牛肉，用叉子按下去后会有鲜血渗出，据说这是罗斯福旅馆的名菜之一。大多数中国人对这样的牛肉下不了口。出于好奇，吃两口可以，全数吃下者则为数不多。^[11]

代表团有3位随行厨师，本来完全能满足大家的需求。不过住在东道主旅馆里，起伙的事情不好说出口。我外公在1973年军委扩大会议时，还提起海容向他诉的苦，说在美国吃不习惯……

好在大家想出一些办法，比如把中国酱豆腐抹在美国面包上，味道还真不错。只是李松龄记得有一次，一位与中方比较熟悉的美国客人来代表团驻地做客，不明就里地用叉子把整块酱豆腐送进嘴里，真是难为他了。^[12]

海容对每日的西餐最不习惯，后来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伸出了援手，紧急运送了一些佐餐的食品。海容记得，自己找了一瓶榨菜，于是就有了真正的美味了。

终于，有一天，久违了的鸡丝汤面又出现在代表团就餐的饭厅里，香鲜异常。这是在代表团上下达成一致后，经过与旅馆友好协商，特许中国厨师做的。^[13]

两盒巧克力

“漫长”的联大生活总算到了尾声，代表团成员每人领到数量不多的零用钱（大约20美元）。海容想法很简单：在驻地花光！

怎么花呢？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人商量后，决定买两盒巧克力，送我外公和总理每人一盒。巧克力约有现在一本画报那么大，成了海容最重要的行李，一路上死活不离手，生怕有个闪失。她一直提到北京，交到了外公和总理手上。

除此之外，海容还给自己4岁的小侄子买了一套玩具，小老虎、小猫、小狗、小羊等个个都只有半个指头大小，很是逗人喜爱。海容一直把自己弟弟王起华的子女视同己出。

12月18日，代表团成员回国。22日下午抵达北京，受到了与欢送同样隆重热烈的欢迎。周总理仍率曾去送行的政治局委员来到机场，江青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大家走下飞机时，中央领导上前亲切握手。接着，代表团成员绕场一周同欢迎群众见面，这时，机场上锣鼓喧天，一片欢腾……

回国后的日子也不轻松。美国特使黑格12天后就要来华，为尼克松打前站，时间紧迫。海容和她的同事们马上又要投入一场新的战斗之中了。

注释：

〔1〕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246—25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月

〔2〕、〔4〕、〔9〕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后部第438—439页，第5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3〕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第1631—1632页。

〔5〕《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73—47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

〔6〕《中美资料（文件和资料汇编）》第336—3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12月

〔7〕、〔8〕陈敦德：《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第177—178页，昆仑出版社1988年9月

〔10〕过家鼎：《众望所归—中国国旗高悬万国国》，《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第3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11〕、〔12〕、〔13〕李松龄：《亦张亦弛—中国旋风席卷联合国》，《中国外交官在联合国》第48页、5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

第五章 | 1972·改变世界

一、从布什访华想到的

2005 年底的一个冬日，我开车去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办事。没想到，往常停车的国博北门禁停。我围着国博绕了一圈也没找到车位，最后停在了几公里外的北京饭店门口。那是上世纪 70 年代北京知名的涉外饭店，据海容介绍曾是高级代表团住的地方。

看到长安街路灯杆上飘扬的中美两国国旗，我意识到今天美国总统小布什来华访问的日子。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已是他在任期内第三次访华了。

寒风中，街道上的行人各自赶路，马路上的车辆时停时行，一切如常。看来，除了对某些地段停车有限制外，美国总统的访问没有对北京市民产生太大影响。然而从我向海容请教和自己的调查可知，33 年前尼克松总统的那次访华，动静之大，绝对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可以说，整个北京都为之动员起来。

我的意思不是苛责前人。相反，如果没有 1972 年 2 月那次成功的“破冰之旅”，如何能想象今天美国总统几乎每年来华一次，每次又几乎是“静悄悄”来去呢？前人的这份遗产，我们绝不能忘记。

国博的事情办完后，朋友约我去长安街上的中国大饭店谈事。此时已是中午，冬日的阳光格外温暖。在步行去北京饭店取车的路上，我瞥见香港电视台的主持人正在街边手持话筒，显然是在报导布什访华的消息。在她身边，是匆匆走过的行人。

到达中国大饭店后，停车又遇到问题。这里也设为禁区。会有谁来呢？我在心里问道。在饭店大堂，彬彬有礼的保安人员请客人留步几分钟，让出一条通道。红地毯前一扇门打开，一群中外男士跟随着一位黑人女士，一边说着事情，一边向饭店大门走去。我认出那是美国国务卿赖斯。两分钟后，警戒撤消，一切如常。

这可能是一次新闻发布会。当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北京时总是出现在钓鱼台或人民大会堂，起码也是北京饭店。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涉外大饭店。而且听说布什总统在京已不像他的父辈那样住钓鱼台18号楼了，而是自愿选择下榻国际俱乐部饭店。这就是今天的所谓选择多样化吧——我想。

二、黑格访华

准将打前站

1972年1月3日，基辛格博士的副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率领先遣小组18人抵京。美方此行主要是为尼克松及其访华的大队人马进行技术安排，即解决访问期间与礼宾、安全、住房、电视转播、记者访问等有关的所有技术问题。

与身材矮胖，足智多谋的德裔美籍犹太人基辛格不同，黑格将军是典型的赳赳武夫，仪表堂堂。美国人大大咧咧、直来直去的特点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应该说，这样的人本来是很适合做朋友的。但乍暖还寒的中美关系何等复杂，黑格将军在华期间果然惹出一连串风波。

节骨眼上得病

美国先遣小组到来，海容本来是准备一心扑在接待工作上的。可是，一向身体皮实的她，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得了重感冒。头一年夏天成立接待小组后，海容就连续作战，马不停蹄，未得休息。不过，得病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由接待美国先遣小组的地点所致。

原来，接待组把位于北京长安街上的民族饭店定为先遣小组的住地，随尼克松来华的大批记者也将被安排在此地。海容作为接待班子负责人之一，吃住都在那里。时值数九寒冬（三十多年前的冬天冷得很，不像现在“暖冬”已成惯例），海容所住房间暖气不足，要命的是窗户不严，露出半指宽的口子，很快就能把人吹出病来，据说美国人也有得病的。要说对黑格的接待后来“降温”，其实一开始温度就不高——当然，这是笑谈。

现在，民族饭店依然在原地矗立。经过装修，外观已焕然一新，内部设施的完善程度也早不是海容那个年代所敢想象的了。1972年在此冻病一事成为海容回首当年的一个小插曲。

海容茶饭不思，吃啥吐啥。不过她还是抱病参加了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的谈判。看来就是在那次，黑格准将说起了那个该死的词——Viability。海容正病得一塌糊涂，不过她很快得知——出事了。



民族饭店——国庆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之一（20世纪60年代）

美方的口信

黑格此行，还负有一项特殊使命，就是受尼克松和基辛格所托向中方转达一个重要口信。该口信在对国际局势、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越南战争和苏联威胁做出一番分析后得出下述结论：

“苏联企图继续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美国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所以美国准备力图抵消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以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希望通过这次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1]

美方口信中提到的“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加强尼克松总统的世界领袖的形象”，凡此种种，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人活一口气。为了共同的利益，中国已做好准备与昔日的敌人建立正常关系，使之成为今日的朋友，但这不能以牺牲自己的民族自尊为代价。“生存能力”之争，非同小可。

中方的反击

1月6日深夜11时30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会见黑格及其所率先遣小组一行。总理和叶帅准备要好好敲打敲打美国这位黑格将军。感冒未好的海容参加了会见，地点是人民大会堂。

总理面前摆着一份《对美方口信的答复》，代表中方的正式态度。

会见时中方向黑格宣读了答复稿。稿子是由外公审定的，其中提到：

“半年前，尼克松总统把中国称之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现在美方口信忽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这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再小的国家，只要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就能顶住外来威胁，自立于世界之林。新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围、遏制、颠覆’

其的企图必定以失败告终……

中美两国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美方口信表示，期望通过访问，加强尼克松总统作为世界领袖的形象。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2]

至于“生存能力”问题，总理严辞批评了美方的提法。黑格尴尬地说：可能我没有正确地转达总统的意思。他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深为周总理不怒自威的魅力，为他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不屈精神所折服。

第二天，也就是1月7日，黑格一行离京赴上海、杭州，考察这两个尼克松即将访问的城市，海容到首都机场为客人送行。为了打起精神，重病的海容专门请民族饭店食堂做了片汤，这次喝了没吐。黑格由熊向晖等陪同向中国南方飞去。大家没有想到，一场潜藏的新的麻烦即将来临。



周总理会见黑格将军（1972年1月）

黑格将军失礼

美国先遣小组随后的情况，海容都是在电话中得知的。大概是在北京挨批的缘故，黑格的心情总是有点灰溜溜的。即便如此，还是得罪了上海方面，受到冷遇。其原因据说是在欢迎宴会上没有起身答谢祝酒。当时出面接待的是上海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主持上海工作的王洪文有事在北京）。

的确，美国人比较粗犷，上海人特别精细，这也许只是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当时上海的负责人多是“文革”提拔上来的新干部，“左”的出奇。他们与熊向晖、章文晋等老干部在如何对待打开中美关系这一大局，如何看待黑格失礼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熊向晖等老同志很为难。上海方面还通知杭州：接待黑格“降温”。具体措施比如：脸无好脸，菜无好菜，还有“糖果减一半”等等。

原来，通过对基辛格一行两次下榻钓鱼台的情况观察，中方发现美方很喜欢中国糖果，每次房间里放多少就不见多少。美国人的确爱吃甜食，上海产的酒心巧克力也的确好吃。不过，再贪吃的美国人恐怕也会忍一忍，省下糖果打入行李，那可是赠送亲友的上乘礼品——从中国带回来的呀！所以，中方决定在客人离开时，为每位赠送10斤糖果。“糖果减一半”是把原定赠送的每人10斤减为5斤。

到达杭州的黑格因“生存能力”事件自知理亏，忍气吞声，不敢得罪中国人。同时，中方陪同人员与当地接待人员就接待“降温”发生争论。在北京，海容接到了汇报电话。海容此时病体稍愈，得知上海、杭州如此接待的情况后，迅速向总理和外公报告。

外公指示“升温”

“美国人的事，不是小事，主席一直关心。”——海容说。果然，外公听完汇报后否定了上海方面的做法，指令立即挽回不良影响。据此，海容赶快给陪同黑格的

班子打去电话，并报告了总理。外公也知道美国人喜欢中国糖，他对“糖果减一半”发出了指示：

“糖果不能减，照送。”

最高领导人的干预使一切云开雾散，接待黑格的温度迅速回升。

上海方面也迅速行动起来，赶在美国先遣小组到达机场前完成了一切工作。和上次送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一样，王洪文赶到机场为美国客人饯行。熊向晖等中方陪同人员总算松了一口气，只是黑格将军还蒙在鼓里，为突如其来的变化莫名其妙。

当天新华社电讯只用一句话描述当时的情形，在知情者看来可谓“尽在不言中”：

“黑格准将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上海时，从北京陪同他们到外地的我国政



黑格将军在上海大厦楼顶俯瞰市容（1972年1月）

府有关方面负责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均往机场送行。”

余波淼淼

那位代人受过的黑格准将，后来升任北约总司令，成为上将。20世纪80年代也曾作为国务卿访华，只是海容再未见过他。

有趣的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一行人中没有见到黑格的名字。是否基辛格怕中方旧话重提，不敢招惹，故而取消他访华资格，就不得而知了。总之，黑格将军与《上海公报》无缘。

1979年，中美建交，“建交公报”成为两国关系史上又一重要文件。当时美国已是民主党人总统卡特执政，共和党人黑格未参与其事。

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问鼎白宫成功，黑格被任命为国务卿。1982年8月17日，中美就限制向台湾销售武器达成公报，史称“八一七公报”。黑格将军力主起草公报，为此不惜以辞职向里根总统表示自己的决心。“八一七公报”是在中美关系史上占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三个公报，黑格对中美友好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被忘记的。

应该提一句的是，在黑格率领的美国先遣小组中，有一位成员后来对中美关系起过很大作用，他就是先后担任福特、卡特和老布什3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1989年7月，中美两国关系遇到前所未有的大麻烦。老布什总统派斯考克罗夫特秘赴北京会见邓小平，此行对修补两国关系功不可没。另外，斯考克罗夫特还是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的“伯乐”。

三、尼克松访华

冷中有热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开始对华访问。

尼克松是2月17日从华盛顿乘专机离开的，途中经过夏威夷和关岛并作短暂停留。《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新华社电讯。

不过，尼克松启程访华前还发表过一段重要的讲话，新华社未做报导，为此受到总理的批评。这段话是：

“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5]

总理认为尼克松这番话非常坦率地说出了两国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在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两国终于开始建立求同存异避免战争的机制，这是历史的进步。新华社未能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作为补救措施，总理把这句话用到了欢迎尼克松宴会的致辞中。

新华社消息还提到随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的正式成员，其中有：

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总统军事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约翰·霍尔德里奇。

尼克松在华第一站是上海，海容在此第一次见到他。

在打前站会谈中，比如交通工具问题，美方认为总统自始至终必须使用自己的专机“空军一号”，中方则认为尼克松在中国领空内应使用由中方提供的专机。双方一度僵持不下。最后中方提出了新方案：允许美国总统专机作为副机，跟随在由中方提供的主机之后。

无奈之下，美方代表提出：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的途中需要在上海加油，而在由上海飞往北京时，希望不必转乘中国专机。中方同意了美方的这一要求，但声明需由中方指派领航员登上美国专机，为其领航，这是显示国家主权的严肃行为。同时，外交部还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总统专机飞往北京。美方对此安排表示满意。海容成为这个先遣小组的一员。

美方专机到达上海，打开舱门后，中方先遣小组以及中方领航员登机。先遣小组成员包括——

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美大司司长章文晋、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礼宾司干部唐龙彬等7人。

他们的任务是专程前往上海迎接并陪同尼克松一行乘坐美方总统专机到北京，这是中国政府官员第一次乘坐美国总统专机。而在美国方面，邀请被访问国官员登上总统专机，也是不多见的。

在座机上，尼克松谈起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时在巴基斯坦装病休养的尴尬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空军一号”是简朴但功能齐全的专机。会议室和起居室只有一些必要的单人软沙发和桌子，并无多少奢华设施。

破冰之旅

尼克松是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最后一年1972年访华的。希望连任的尼克松，对此寄予厚望。他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能够大大加重美国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因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公众会支持自己在下一个任期继续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不过，“中国之旅”绝非易事。1969年美国飞船即已登月，美国总统访华则在1972年。分隔中美两国的太平洋，竟比地月之间的大气层和星际空间还难跨越。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尼克松此行被西方媒体称为“破冰之旅”是很有意思的。或把冰山分开，或被冰山所困，访华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同时存在。

作为第一个访问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和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在职美国总统，尼克松一定会面对美国国内反共及反华势力的强大压力。另外，尼克松于1953年结识的“老朋友”蒋介石，也在暗地里怒责他“朝毛”（即朝拜毛泽东的意思）、“向毛叩头”了。台湾在美势力对美国政要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

作为共和党推举出来的总统，尼克松时刻要小心在野的民主党。何况由于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美国已很狼狈，严酷的形势不容许他犯下大错。

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夫人与尼克松总统并排手挽手顶着寒风稳步踏上专机舷梯。然后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拒绝与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代，终于过去了。

安静的机场上，人们甚至能够清晰地听到两国国旗在凛冽的寒风中猎猎飞舞时发出的声响。中美两国首脑检阅完仪仗队之后，乐队演奏了两国国歌。但是，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

突如其来的会见

就在这时，外公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4]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

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

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即书房）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副主任张耀祠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另外还通知了秘书徐业夫。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5]

外公如何准备

在吴旭君忙碌的同时，外公也相应做了些准备，《参考资料》2月21日上午版刊登了以下两篇对外公会见尼克松有用的材料，外公应该是在会见前看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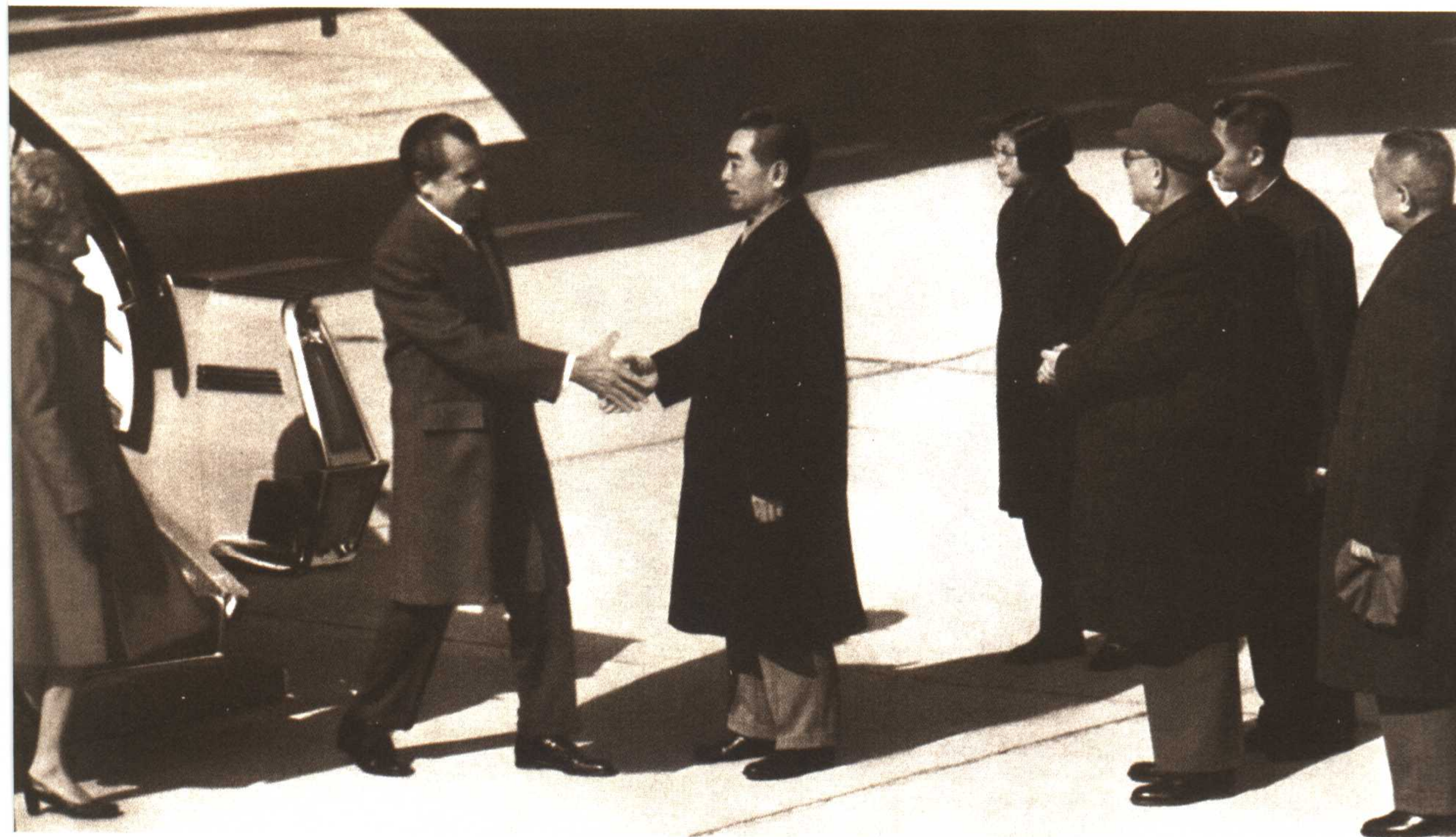
第一篇是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中国前，在临时落脚地关岛对记者发表的讲话。其中有这么两句：

“总统说，他期望他同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

“尼克松说，毛和周都是“有哲学头脑的人物，他们不是仅仅讲究实际的、注意日常问题的领导人。”^[6]

第二篇是“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开会典礼中的致词：

“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我们对任何有损于



《人民日报》发表的中美首脑握手照片（1972年2月21日）

左起：尼克松夫人、尼克松、周恩来、王海容、叶剑英、韩叙、李先念

中华民国主权利益的行动，保有高度的警惕！”^[7]

在不久尼克松到来后，这两篇材料被外公借题做了精彩发挥，成为会见中的画龙点睛之笔。

总理下午2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客人已去驻地休息，4点半将有全体会谈，7点钟还有欢迎宴会。

总理非常着急，海容马上按总理的吩咐，叫韩叙来。礼宾司代司长韩叙随即赶到。总理对他连说两遍：赶快准备、赶快准备！一向精明能干的韩叙却摸不到头



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检阅三军仪仗队（1972年2月21日）

脑，见此情况，海容对韩叙做了解释。最后，总理决定分头行动：自己赶往尼克松所在的钓鱼台十八号楼说明情况，再去游泳池检查会见准备；海容赶往中南海游泳池，安排安全保卫及摄影摄像等工作；另外，安排尼克松尽快前往外公住处。

基辛格的回忆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这样回忆道：

“1972年的那一天，两点三十分，我们才吃完丰盛的午餐，有人来告诉我，周恩来有急事在会客室等着要见我。他不像往常那样先开开玩笑，而是直接对我说：‘毛主席想见总统。’我问他是否带温斯顿·洛德同往，他同意了……”^[8]

1971年10月基辛格访华，1972年1月黑格访华。他们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期间，中美双方每次都要谈到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何时会见尼克松总统？中方回答照例是：现在无法确定。尼克松、基辛格心中总像有一块石头没有落地。另外，美方对与外公会谈并不是没有疑虑。尼克松提到过同行的国务卿罗杰斯2月17日对他说的一段话：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9]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

“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時間。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也可能是故意如此布置，因为轻易不露面可增加神秘感，令人可望而不可及更能提高威严。”^[10]

关于外公的传闻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导过4次，分别是：

1971年10月8日，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一行（10月6日抵华，13日离华）。

1971年11月22日，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及其率领的党政代表团（11月20日抵华，27日离华）。

1972年1月10日，出席外交部长陈毅追悼会。

1972年2月1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夫妇（1月31日抵华，2月2日离华）。

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

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中方主随客便

得知外公即将会见总统，根据美方提议，由尼克松、基辛格和洛德出席。中方按外交惯例，主随客便。

必须提到的是：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以及随同来华的国务院诸公因此失落并且愤怒过好一阵子。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历史性会见，美国外交最高长官居然没有参加，连记录人员都没派去一个。尼克松、基辛格与国务院的矛盾积聚已久，后来在杭州围绕中美《联合公报》定稿爆发。

不过，老谋深算的基辛格博士怎能轻易在中国总理面前表露出美方真实的心情呢？于是，他耍了一个小滑头。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

“我决定装作冷淡一点，便问周恩来，在当晚的宴会上他准备念讲话稿呢还是作即席发言。他表示将念稿。我又问他，我们讲话稿的语气应该温和一些呢还是强硬一些，以便和他的语调相配合……”^[1]

随即，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通向红墙之路

20世纪70年代初期，北京街面上车辆稀少，大路宽阔，从钓鱼台国宾馆到中南海游泳池，匀速行驶只需十几分钟。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第一次来到中南海。在此后的30年中，他们两人分别来到这里的总和达十几次之多。这一切都源于1972年2月21日下午的这第一次。

对于通往外公住处的路径，尼克松后来再没提及，基辛格则写得十分详细，这大概与他在其后的4年中4次在中南海游泳池见到外公有关。

基辛格将中南海西门称为接近外公住处的“一个红色的大门”。他还提到门前是东西走向的宽阔大街，其实此街应是南北走向的，即府右街。他说“这条街是拆掉旧城墙而修建的”，这也不对，府右街至今还留有明清两代皇城城墙的许多遗迹。所谓拆掉城墙后修建的街，应指北京今天的二环路地铁沿线。不过，对于并非汉学家的基辛格博士而言，能讲出这些，已属难得。基辛格继续写道：

“绕过红墙，我们经过一条甬道，开头的一段路两旁都是平常的房子，看不出



外公与埃塞俄比亚皇帝赛拉西一世握手
(1971年10月8日)



外公与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握手（1972年2月1日）



外公在人民大会堂外送客

那些外观平庸的院墙后面有些什么样的建筑。过了一大段路，两旁的房屋不见了，这里一边是湖一边是树林。毛泽东的住房单独在一处，外表简单平常，这里可以是任何一个低级官员的住处。眼前看不出有特殊的安全措施。”^[12]

总统丢了

在外公住处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总理在此迎候客人，并引领尼克松一行向外公的书房走去。在大门口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是汪东兴和张耀祠，也就是1970年在此迎接斯诺的“两位将军”。

据汪东兴回忆：按照惯例，外宾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外公住处。因此，他立即安排尼克松的警卫去怀仁堂休息。该警卫在此无法与仍在钓鱼台的美方警卫主管取得联系，尼克松去往何处，一时间成了空白。美国总统警卫主管如雷轰顶，并因此向中方诉苦，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游泳池印象

外公在游泳池的住处与丰泽园不同，这里是建成不久的新式房屋，外宾的车可以一直开到门口。客人下车后直接进入室内，无须像丰泽园时代在古老的院门前下车，在露天下走路进院。在外公晚年会见外宾的新闻纪录片中，红旗车开进门廊的镜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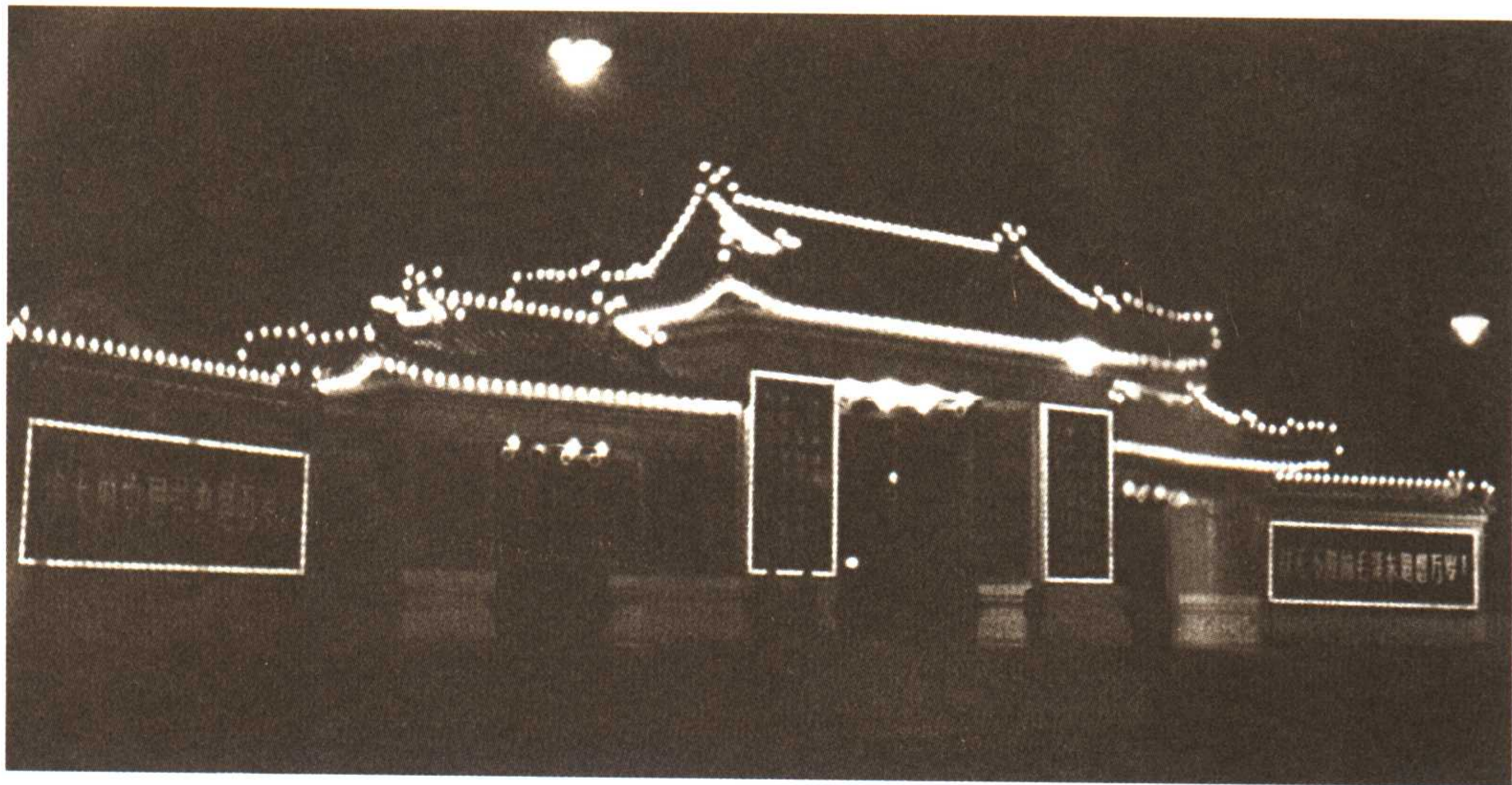
通往外公书房的路是曲折的。尼克松等人随海容先是走入一间小会客室(外公晚年已不再使用这里),再穿过一间乒乓球室——基辛格将其称为“过道”。他还记住了摆在那里的一张乒乓球桌,至少在两次来访时都看到过它。球室空荡荡的,球桌久未使用,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其实,上一场球赛已举行完毕。中美两国以地球为球室,太平洋为球桌,以东西方政治智慧为球拍,以穿梭联络人为乒乓球,比赛成绩是双方握手言和。

海容推开乒乓球室的门,对面就是外公的书房。

外公的书房

尼克松、基辛格曾把斯诺的文章作为访华人员的必读材料,他们自己也都读过。因此,对于“毛酷爱读书”这一点并不陌生。尽管如此,走近外公的书房时,基辛格还是发出了感慨。对美国人而言,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



20世纪70年代中南海西门夜景



游泳池书房兼会客室

架上、书桌上摆满了古书。基辛格曾描述过：

“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13]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这次来访，是外公第二次使用自己的书房会见国宾。

1959年10月人民大会堂建成之前，外公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1971年9月“林彪事件”使他重病之后，会见外宾多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该年10月和11月，外公强打精神，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一世和越南总理范文同。1972年2月1日，即会见尼克松20天前，病体未愈的外公改在书房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此后，他再没能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过外宾。

基辛格对外公书房观察很是细致，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

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14]

从外公的书房看不到外面的景色。巨大的窗户都藏在厚厚的大红窗帘之后，书房顶部装有日光灯池，沙发旁边还有落地灯。在基辛格看来：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此外，房间内的陈设就和屋子的外观一样，简单朴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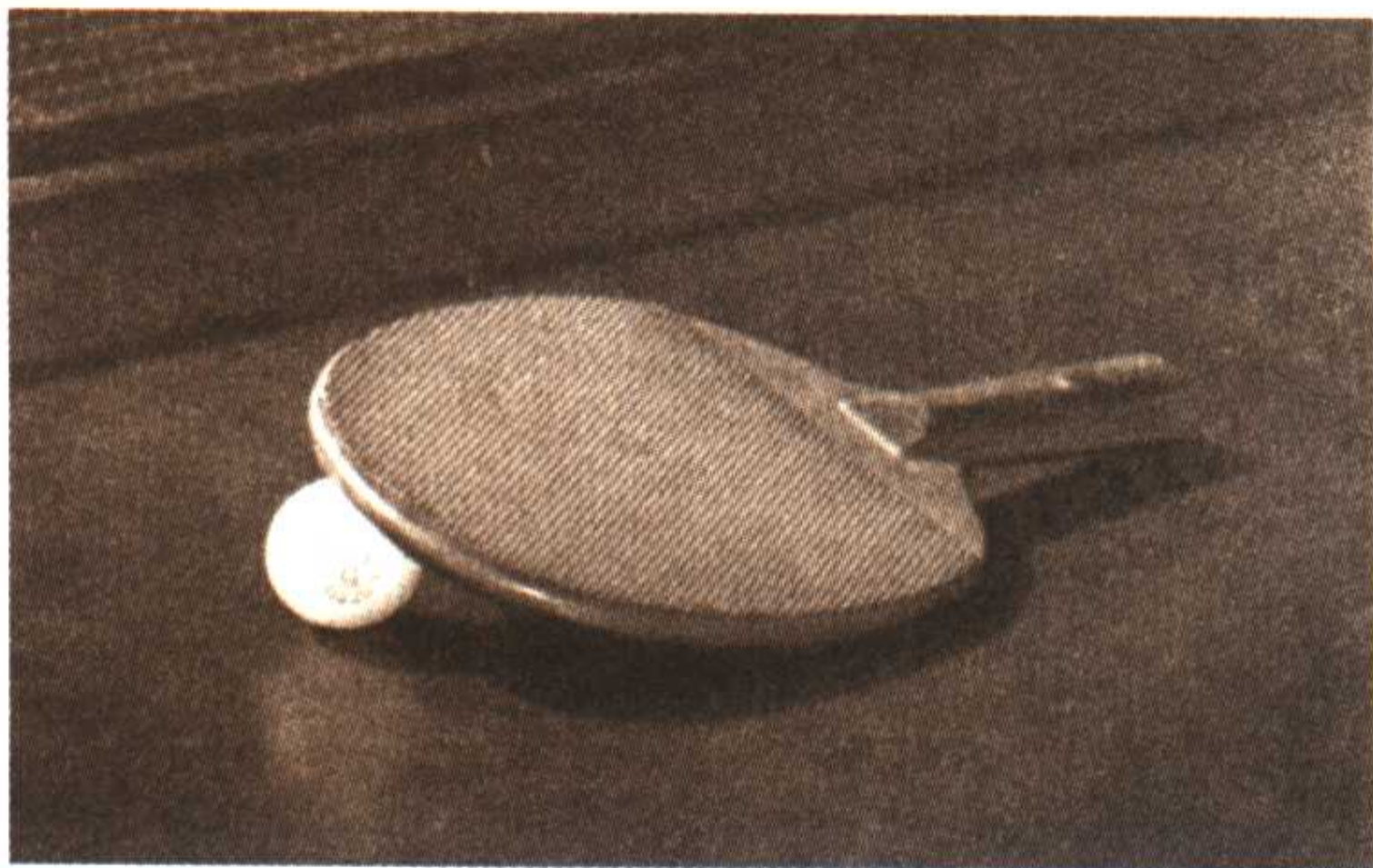
总理陪同客人进入书房，坐在沙发上等候的外公被搀扶着站了起来。外公的身体已不容许自己走到门口迎接客人。他努力站直了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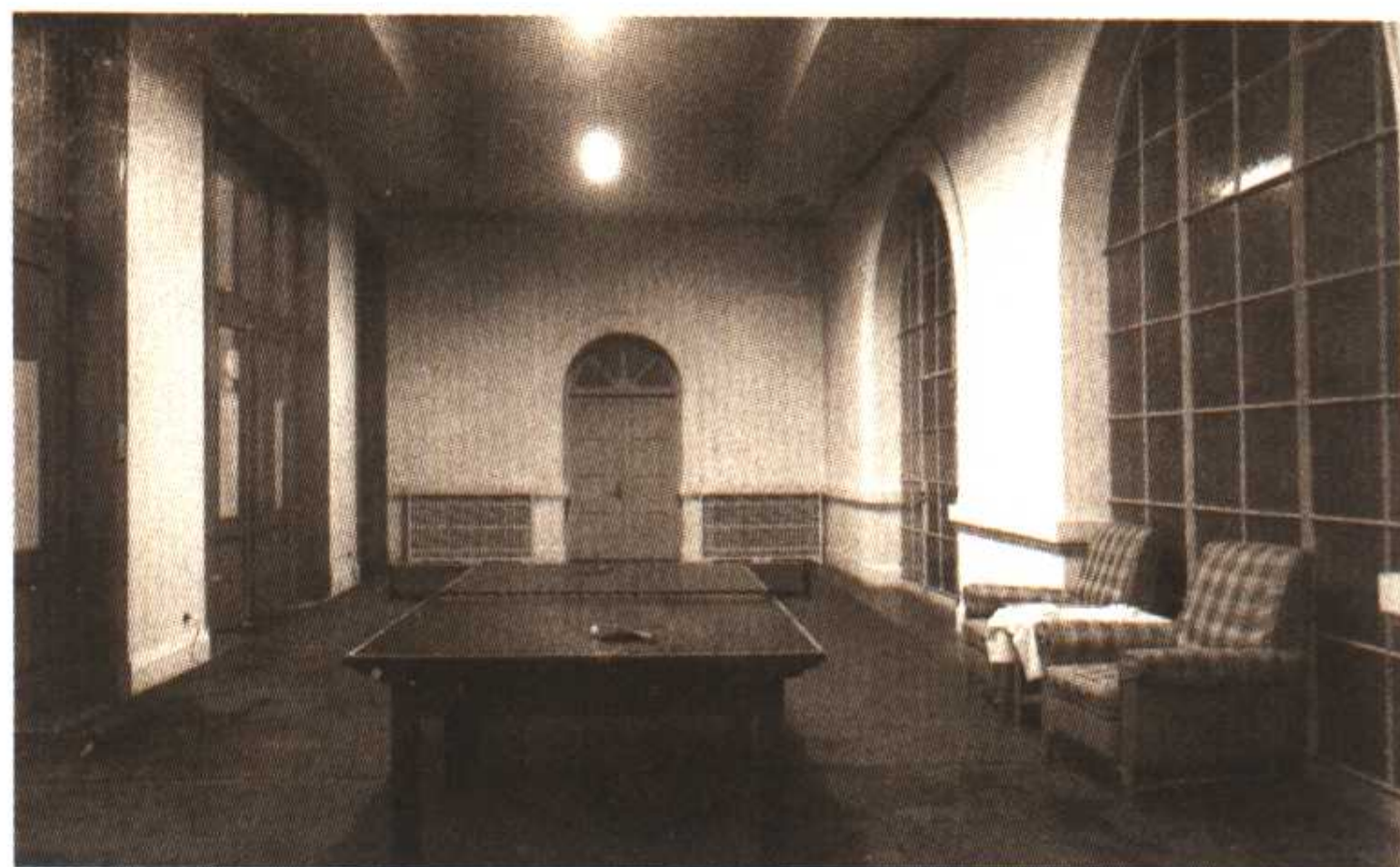
外公晚年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外景



游泳池门廊之一



外公的乒乓球和球拍



游泳池乒乓球室

两个“魔鬼”见面

1971年10月8日，外公在会见塞拉西时，曾不无调侃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魔鬼与资本主义魔鬼见面，到底好不好呢？”现在，世界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与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领袖在同一间房子里见面了。他们彼此端详着对方。尼克松回忆道：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他所应得的尊敬。他伸出手来，我也伸过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在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尽管他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维仍然像闪电一样敏捷。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却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15]

中美最高级会见

这次中美最高级会见，外公别出心裁地选择了尼克松抵华前曾谈起的“准备和毛、周谈哲学”一事作为开场白。显然，作为哲学家，他认为中美双方应该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考虑问题，“而不是只集中讨论眼前的问题”。以下是这次会见的部分记录（为行文方便，分别称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为毛、周、尼、基）：

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众笑）

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读了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中方笑）

毛：（指基辛格）他是博士。

尼：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指基辛格）今天主讲要请他，博士，philosopher，哲学博士。

尼：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我过去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读主席的选集。

毛：我那些东西算不得什么。

尼：毛主席的著作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

毛：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几个地方。^[16]

随后，外公又提到了自己刚刚看到的蒋介石致辞，巧妙地把台湾问题引入中美最高级会见——

毛：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

周：就是在他们最近召开的“国会”上。

尼：蒋介石把主席叫做共匪，主席把他叫做什么呢？

周：我们一般叫蒋介石集团，新闻里面有时也叫匪。

毛：那还不是匪？彼此叫匪，互相对骂。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跟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

周：从1924年开始。^[17]

关于中美关系，外公和尼克松谈了这样几段话：

毛：所以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 table tennis 起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两年多了。

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往来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死不

肯。十几年，说是不解决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巴基斯坦前总统介绍你和我们认识。

我们这方面也不那么高兴那位约翰逊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我们也都不那么高兴。这个中间有八年的共和党，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想通。

毛：大概我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民族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这一套，建立社会主义。

尼（微笑）：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外公与尼克松握手（1972年2月21日）



中美最高领导人握手
(1972年2月21日)

尼（笑）：就没有靶子了。

.....

毛：所以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尼：他的死很令人悲伤的。

毛：人们会说话的。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你怎么办啊？^[18]

这时，会见即将结束。尼克松再次握住外公的手说：

“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外公的回答是：

“我就不送你了。”^[19]

至此，原定15分钟的会见已延长到1个小时之久。据吴旭君回忆，送走美国

客人后，外公已很疲惫，在沙发上坐了30分钟才去休息。

在1小时左右的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均未发现外公病情的严重。基辛格多少感受到了外公特有的气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撼。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20]

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21]

美国客人不会知道：医护人员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在不久前的大病中，外公严重休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这次会见的照片和消息第二天见报，消息立即传遍全世界。新华社通稿部分如下：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同他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谈话。

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和翻译唐闻生。

2月21日外公与尼克松总统的会见是何等精彩，是不是再安排一次呢？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虽说外公晚年会客大大减少，一拨客人只会见一次，但是尼克松来华既然属于特事，也就可以特办，不是吗？几天来，总理一直为第二次“毛尼会谈”做着准备。当然，这样重大的事情，是需要考虑各方面因素，最终由总理乃至主席决定的，海容的任务是做好预案。遗憾的是，尼克松首次访华期间，未能与外公再次会见。他们的第二次见面，已是整整4年后的事情了。



外公与尼克松交谈之一



外公与尼克松交谈之二

北京的雪

有道是天有不测风云。2月21日尼克松到京，中午是大晴天，其后开始阴天下雪，一直下到22日转为大雪。这两天尼克松或参加会谈，或去故宫参观，活动地点都在北京市内，受天气影响还不大。24日原定日程是上午游览八达岭长城。长城距北京市内八十余公里，一半以上路程山高坡陡。正常情况下尚需多加小心，路面积雪的情况下则很难保证行车安全。长城之行怎么办，我方接待人员为此非常头疼。

一个方案是把活动推迟到25日上午。经向气象台多次核对查询，25日的天气



外公与尼克松交谈之三



外公与尼克松握手（1972年2月21日）

将更转恶化，而26日上午尼克松就要离开北京去杭州了。另一个方案就是取消此次活动。不过登长城是尼克松的一个宿愿，美国客人当时也已听说这句话：不爬长城，不尝烤鸭，等于没来中国。

23日晚上，总理来到中方接待班子办公处——人民大会堂南门二楼，参加接待小组例会。大家就长城之行难以做出定论，最后由总理下了决心，连夜发动北京市民扫雪。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0点钟。次日早晨8点，尼克松一行去长城的车队就要出发了。

总理拍板进行扫雪之后，命令一层层通知，主力是在京驻军。一夜过后，第二天7点钟，马路全都清了，雪都堆在两边。北京市还连夜动员上百辆洒水车喷洒盐水，促雪融化。清扫八十余公里的积雪，保守估计也要动用六七十万市民，甚至有说百万人的。这一天，市民们骑着自行车汇成上班的滚滚人流，一切照常，就像什么都发生过一样。住在民族饭店的美国记者对扫雪一事很感兴趣，拍了不少照片。

车队浩浩荡荡走在路上。尼克松等美国客人得知中方扫雪一事后，大为震惊。此事对他们的影响超过去长城本身。一件在美国不可思议的巨大工程，在中国悄无声息地一夜之间完成。

2月25日，尼克松举行答谢宴会，以此结束在北京的5天访问。

杭州“捉迷藏”

2月26日，周总理陪同尼克松飞往杭州游览。

26日上午，海容是第一批抵达杭州机场的。那天天气不好，她所乘的小飞机在汹涌的气流中左右颠簸，海容把这叫作“摇煤球”。

中美两国首脑在杭州有一项活动，那就是下午3时到达西湖花港观鱼景区，共同观看尼克松总统送给中国人民的红杉树。

双方说好分头行动，去花港公园汇合。总理先于尼克松到达汇合地，却一直不见美国客人的踪影。几分钟后，终于看到了尼克松一行的身影，总理和尼克松见面后哈哈大笑，外电形容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杭州游览花港公园时玩了一场有趣的“捉迷藏”游戏。

27日一早，中美首脑一行飞赴上海。在上海，又发生了因房间紧张，把罗杰斯国务卿安排住在锦江饭店13层的事情。海容听说，对这种触犯西方禁忌的作法，罗杰斯很不愉快。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也因此议论纷纷，借题发挥，宣泄对尼克松、基辛格在对华外交方面绕开他们的不满。他们横生枝节，对中美联合公报草案提出



《人民日报》发表的中美最高领导人会见照片（1972年2月21日）

重大修改意见。总理在亲自登门看望罗杰斯时，对美国国务院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表示感谢，罗杰斯非常满意。经过艰苦的谈判，美国国务院专家也做出了让步。就这样，一场可能爆发的危机化为乌有。

2月27日下午5时，中美两国向新闻界公布了《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被称为“上海公报”。



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夫妇步入宴会厅
(1972年2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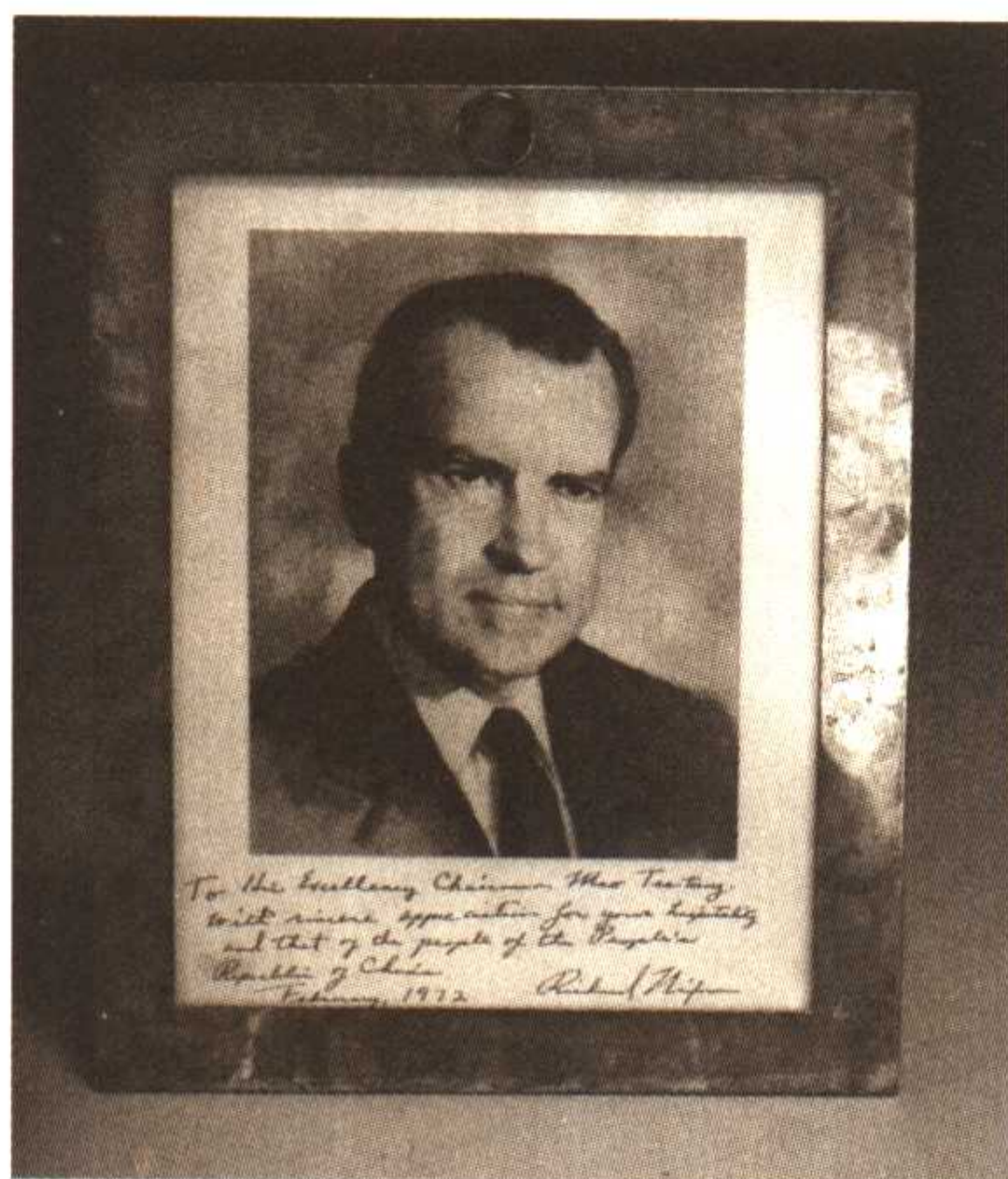


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碰杯（1972年2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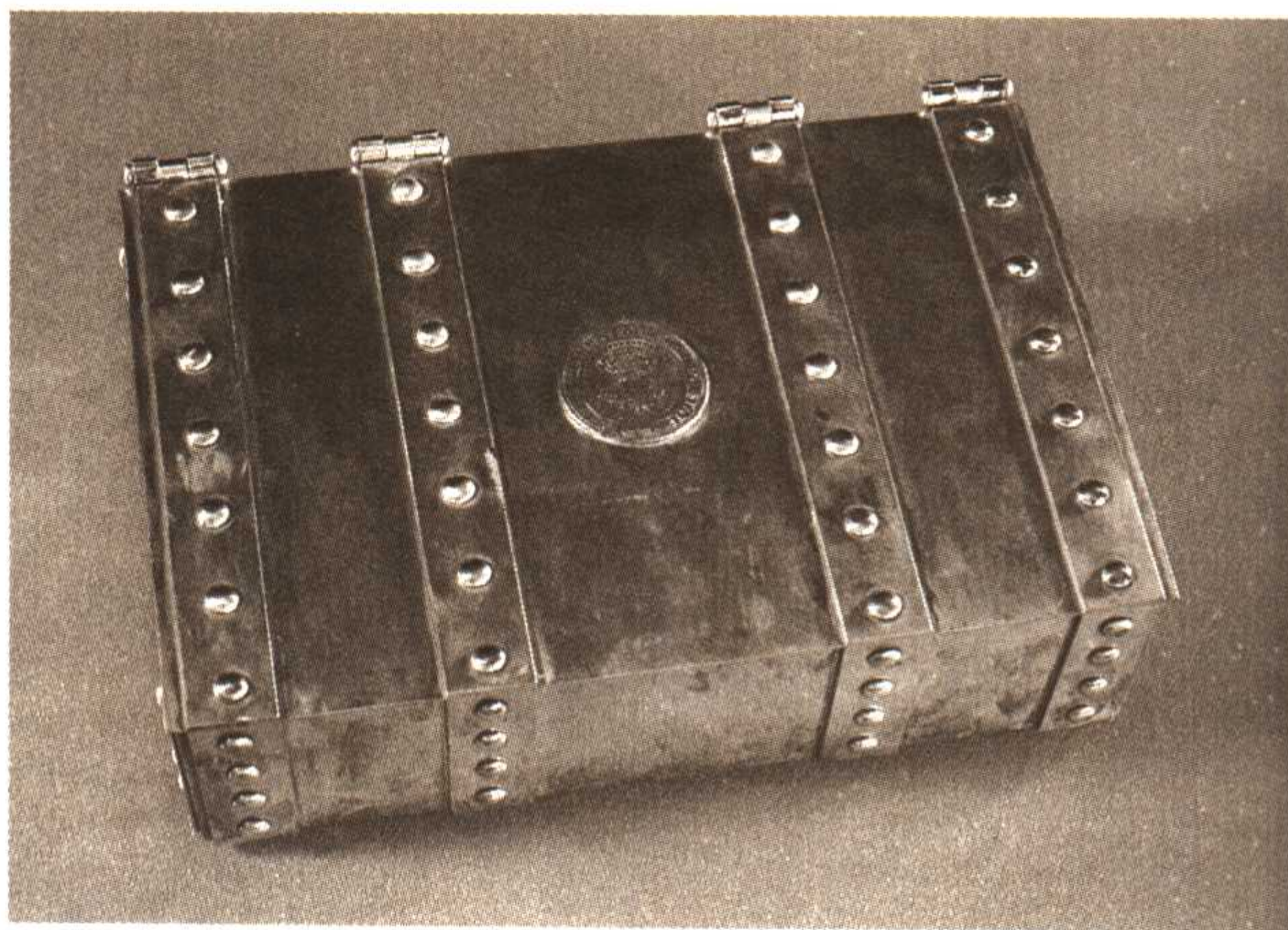
周总理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欢送宴会。在即席讲话的最后，尼克松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上海挽留总理

最累的还是周总理。28日上午送走尼克松，总理原准备当天晚上回京。上海



尼克松总统赠毛主席的国礼之一：亲笔题字的银框照片



尼克松总统赠毛主席的国礼之三：银烟盒



尼克松总统赠毛主席的国礼之五：水晶玻璃花瓶



尼克松总统赠毛主席的国礼之四：珊瑚盆景



尼克松总统赠毛主席的国礼：烧瓷天鹅（局部）

方面找到海容说：让总理晚上别走了，这几天太累了！此话正中海容下怀，她觉得大家是应该休息一下了，尤其是总理，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何况从北京过来的中方人员也为此次尼克松访华辛苦了几个月。海容向总理汇报，总理同意了。办完这件大事，他的心情确实愉快。那天晚上，上海方面设宴招待总理一行，饭后看了演出《红色娘子军》。



周总理在杭州机场陪尼克松总统登机（1972年2月26日）



周总理与基辛格博士在上海机场

北京欢迎总理

2月29日上午，正在准备回京事宜的海容接到电话，是吴旭君打来的：

“海容，你们什么时候回北京？主席让我告诉你，要组织5000人的队伍，在北京机场欢迎周总理的归来。”

海容连忙答应下来，马上打电话到北京，通过外交部礼宾司联系北京市外事办，她强调：这是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做好。然后，在回京的飞机上，海容报告总理：主席说了，要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呐！总理高兴地笑了。

总理一行于下午4点抵达北京机场。这里多年没有举行欢迎总理的仪式了。新华社电讯报道说：

“江青、叶剑英、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等同志，迎上前去同他们亲切握手。当周恩来总理等同志和前来迎接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来到欢迎队伍面前时，机场上的群众一片欢腾，人们敲锣打鼓，挥动花束，不断高呼：‘热烈欢迎周总理一行！’‘坚决支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毛主席万岁！’周恩来总理等不断地向欢迎群众鼓掌，亲切致意。”

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

对此，外公说得很透彻：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2]

外交丰收之年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向中国敞开了大门。1972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之年。



周总理与尼克松总统、罗杰斯国务卿及基辛格博士在去杭州的飞机上（1972年2月26日）



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夫妇游览西湖（1972年2月26日）

2月14日，中国与墨西哥建交。随后，相继与阿根廷、毛里求斯、圭亚那、多哥、马尔代夫、马尔加什、牙买加、乍得等建交。再加上此前与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已与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第三世界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坚力量。

3月13日，中国和英国互换大使，两国之间1954年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日本、联邦德国、卢森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继正式建交或实现外交关系升格（马耳他已于该年1月与中国建交）。上述9国都是第二世界的成员，中国与第二世界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1972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刷新了1971年15国建交的纪录。

四、与第二世界国家的交往

日本以及西欧诸国、北美的加拿大、澳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第二世界”范围。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争取团结“第二世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0年，与加拿大、意大利建交；1971年，与奥地利、圣马力诺、比利时、冰岛建交；1972年，与英国、荷兰、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交或外交关系升格。

在开展对美外交的同时，外公对第二世界国家非常关注，从1970年到1976年他指导了与这些国家发展外交关系重要过程。他先后会见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英国前首相希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西德总理施密特、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与他们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海容作为外交部官员参加了多次会见活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日本田中首相的访华，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外交活动。

田中访华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与中方商谈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年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又一举世瞩目的外交事件。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建国以来，外公和总理一贯重视中日关系，制定“以民促官”的方针，亲自指导中日之间大量的民间外交活动。到了1972年，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水平的交往，为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美关系的打开，给日本朝野极大震动，刚刚上任的田中首相决心在其任期内实现中日关系的突破。

9月25日，日本首相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在当天的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致辞，其中有这样一段：

“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次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中日两国政府首脑的讲话。“添麻烦”一说引起风波。的确，“麻烦”这个词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据《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记载：周总理会谈时向田中首相指出：“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

对此，田中首相表示，对不合适的表述可以改。他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述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

此后，中日双方举行三轮首脑会谈，意见逐步达成一致。9月27日，外公会见田中角荣首相，谈话的气氛轻松而活跃。《毛泽东传（1949—1976）》记载了会见的情形——

会见开始不久，外公问田中首相：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了？

田中首相答道：“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添麻烦”问题的解决，预示着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即将顺利成功，为此外公也很高兴。他说：“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嘛。”



周总理一行由上海回到北京在机场受到热烈欢迎（1972年2月29日）

田中首相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外公表示同意，他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

于是，外公又谈起年初会见尼克松时的情形。他说：我对尼克松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编注：即田中角荣]的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会见即将结束时，外公还向田中首相赠送了自己的藏书——《楚辞集注》和怀素草书字帖，日本客人惊喜不已。

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两国从即日起实现邦交正常化。与中美从1972年峰会到1979年建交用了7年时间相比，中日复交直截了当，可谓“一步到位”。

至于改变“添麻烦”的说法，在双方最后达成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

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是外公始终重视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外公决定打开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国全方位外交之时，对第三世界的关注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

从1970年左右，中国大规模的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到1976年，中国先后与智利、尼日利亚、伊朗、秘鲁、墨西哥、阿根廷、马来西亚、委内瑞拉、巴西、菲律宾、泰国等40个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就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发展了关系。

这期间，外公会见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海容作为负责礼宾事务的外

交部官员，参加了多次外公的会见活动。亲眼看见外公与众多第三世界领袖会见的风采，见证了中国走向世界，并向世界开放的历史时刻。外公与各国领导人纵论世界大局，谈论新的历史时代。

很多次会见中的一些小故事，也给海容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2年6月28日，外公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外公非常欣赏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蜡染服装，还提议中国妇女也应该学习。

1973年1月13日，外公会见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外公对蒙博托的真豹子皮帽子非常感兴趣，风趣的说：“真吓人！”

1974年9月27日，外公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特别代表、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出人意料地对马科斯夫人行了吻手礼。

1975年10月19日，外公会见马里国家元首夫人玛利亚姆·特拉奥雷时，他风趣地学着夫人行了一个屈膝礼。

.....

而作为当时第三世界的重要一员——伊朗，中国特别注意发展与其外交关系。

1971年4月开始，两位伊朗公主先后到中国访问，海容作为女外交官，奉命与李先念副总理夫人林佳楣，以及资深女外交官许寒冰全程陪同。访问中经历了许多趣事。这件重要的外交活动，反映了中国政府当时执



外公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中）与外相大平正芳（右）
（1972年9月27日）

行外公和总理制订的积极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伊朗公主访华

还是在“乒乓外交”期间的1971年4月14日，总理在会见美国乒乓球队后，下午会见伊朗驻联合国代表阿什拉芙公主，地点还是人民大会堂。周总理和阿什拉芙公主是老朋友。

1965年，阿什拉芙公主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10周年纪念活动时与周总理相识，成为朋友。公主是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妹妹，国王很多大事都委托她办。公主此行身负伊朗与中国接触及建交的重任。伊朗是西亚大国，总理对其来访非常重视。

阿什拉芙公主是由外交部新闻司、礼宾司和西亚非洲司3位副司长级别的女同志，于4月13日从上海接到北京的，其中的礼宾司负责人就是海容。



两国政府首脑互换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8日）



周总理与田中首相步出人民大会堂



周总理与田中首相在上海机场握别



田中离沪后，上海组织 6000 群众热烈欢送周总理回京（1972 年 9 月）



上海机场打出横幅“热烈欢送周总理一行”（1972 年 9 月）

阿什拉芙公主行为、举止都很西化，风度翩翩，容貌秀丽，而当年已 52 岁了。在上海接机，公主初见海容就笑着说了一句话，搞得她很不好意思。原来公主说：

“我还以为你是献花的小姑娘呐！”^[23]

14 日晚，周总理设宴欢迎阿什拉芙公主，海容记得是在前门烤鸭店。当时，这家百年老店的条件还很简陋，上下需登木制楼梯，嘎吱作响。上楼时总理挽起公主，搀扶她同行；下楼时亦然。总理以身作则的工作精神和优雅风度给在场的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

说来好笑，烤鸭本是北京特产，多少外宾赞不绝口，把未尝其味视为遗憾。但对海容来说却无福消受，她一点吃不得鸭肉。招待阿什拉芙公主那次，出于外交礼仪，海容只好以面饼卷黄瓜囫圇果腹。都说外交官风光，国宴气派，谁又能想到礼宾官海容的苦衷呢？

城楼之夜

4月13日至19日，海容全程陪同阿什拉芙公主在上海、北京、杭州和广州的活动。公主访问圆满结束后仅11天，她的妹妹法蒂玛公主接踵而至。

伊朗公主姐妹接连来访，虽然两国尚未建交，已显示关系非比寻常。中方为此指定李先念副总理夫人林佳楣、姬鹏飞代外长夫人许寒冰与礼宾司负责人王海容全程陪同。3人从广州把抵达中国的法蒂玛公主接到北京。

4月30日至5月12日，海容全程陪同法蒂玛公主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长沙、韶山和广州等地参观、游览。

4月30日晚上，周总理会见并设宴招待法蒂玛公主一行。第二天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总理有许多事情需要安排。选择这个晚上会见伊朗客人，足见对两国关系的重视。公主第一次见到总理，不由得赞叹这位大国总理的超凡魅力，为之倾倒。

次日，公主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参加晚会的中外人士有几百人。晚会行将结束，公主迟迟不走，原来是想多看总理几眼。海容怕影响总理休息，半扶半推把她劝下城楼。



阿什拉芙公主参观广交会（1971年）



总理在医院会见阿什拉芙公主（1975年）

此后，海容陪同法蒂玛公主离京赴外地游览。她们一行到过湖南长沙，公主住在当地条件最好的宾馆——蓉园，外公回湘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那次，她们还专程去韶山参观了外公故居。法蒂玛公主毕竟是金枝玉叶，在饮食方面要求比较独特，闹出不少笑话，好在都被海容随机应变解决了。

长城上跑步

有一天在长沙，天空正下着毛毛雨，公主提出要散步。海容觉得自己义不容辞。公主来了兴致，还要跑步。没办法，跑吧。海容甩开胳膊，陪公主跑了起来。公主又高又壮，海容又瘦又矮，远看两人的背影，很是好笑。

这并不算什么。在北京的时候，见到雄伟的人类奇迹长城，公主很是激动，跑起步来。海容对林佳楣、许寒冰两位老同志说：你们歇着，我去！随后就一路跟随公主，跑到客人尽兴为止。

针灸记趣

公主到广州的时候，对中国针灸产生好奇，坚持要试一试。可是大夫穿着白大褂，刚刚拿针进屋，公主就大呼小叫起来，使得海容哭笑不得。公主叫来一个随从试针。没想到，随从按大夫的安排躺在床上，露出腿来，还没扎的时候，就大呼小叫起来……公主的随从是个男的，海容记得他胖乎乎的，个子不高。大家劝他平静，不要怕。大夫一边跟他说话，分散注意力，针扎了进去，他也没什么感觉。公主看到这里，也扎了针。她不为治病，而是好奇。

公主与邓大姐

阿什拉芙公主于1975年5月和1976年7月再次访华。中国和伊朗于1971年

8月16日建交。其后，伊朗王后、王弟和首相先后访华，中伊关系发展密切。

法蒂玛公主此后再未访华，但她的故事没有结束。

1978年，周恩来夫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团访问伊朗、法国等国。这也是对上述国家元首曾邀请周总理访问的感谢。阿什拉芙公主和法蒂玛公主姐妹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迎接中国代表团，法蒂玛公主陪同代表团游览德黑兰的名胜古迹。她在欢迎宴会上取出自己珍藏的照片给中国贵宾看，那是1971年5月1日她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公主深情地说：能够见到邓大姐，我非常高兴，周总理是我深深怀念的伟人。邓颖超对此表示感谢。^[24]

转年的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告终。此后海容再未听到两位公主的消息，她自己也在此前后离开了外交部，结束了外交生涯。



阿什拉芙、法蒂玛两位公主
赠毛主席的国礼——毛织波斯地毯



周总理与法蒂玛公主握手（1971年4月30日）



法蒂玛公主等贵宾看登载周总理会见她们的消息的报纸（1971年5月）

左起：外交部副司长许寒冰、对外友协林佳楣、巴基斯坦空军司令拉希姆·汗夫人、伊朗首相胡韦达夫人、法蒂玛公主



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法蒂玛公主、巴基斯坦空军司令拉希姆·汗夫人（右一）交谈（1971年劳动节）



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伊朗期间，法蒂玛公主陪同出席欢迎宴会（1977年）

注释：

[1].[2] 魏史言：《黑格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8~79页。

[3] 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第2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

[4] 吴旭君：《毛主席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第630、6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5] 林克、吴旭君、徐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第254—2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

[6].[7]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263—29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月

[8] 基辛格：《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白宫岁月》中译本第1344—134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

[9]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第249页

[10].[11].[12].[13].[14] 基辛格：《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白宫岁月》中译本第1346—134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

[15]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第249页

[16].[17].[18].[19]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第267—26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1月

[20] 基辛格：《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白宫岁月》中译本第1347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

[21] 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中册中译本第249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

[22] 林克、吴旭君、徐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第254—2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月

[23] 阿什拉芙·巴列维：《伊朗公主回忆录》第173页，新华出版社1984年6月

[24] 金凤：《邓颖超传》（下册）第65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

第六章 | 尾声

“三个世界”

进入1972年后，外公的身体明显衰弱。

1月10日，外公临时决定出席陈毅追悼会。那是北京一个寒冷的冬日，悲凉的心情加之恶劣的天气，使老人家很快感冒了。一个月后的2月12日，外公突发休克，危情千钧一发。

2月1日，外公不得不在中南海游泳池家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从此再未到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身体状况已不允许外公轻易出现在公共场合了。

在中国外交蓬勃开展的同时，外公进入人生的暮年，他仍以闪电般敏捷的思维把握着国际形势，思考着人类战争与和平、建设与发展的课题。

1974年2月22日，外公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三个世界”的论断，对几年来的大外交做了总结。当天的新华社电讯这样报道：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讯 毛泽东主席今天下午会见了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士和夫人贝蒂卡翁达。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

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总理、王洪文副主席、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和章含之。

根据发表的记录，会见时宾主是这样谈起“三个世界”这一话题的：

毛主席：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

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卡翁达：我同意主席先生的分析。

毛主席：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你看这个解释好不好？

卡翁达：主席先生，你的分析很确切，十分准确。

毛主席：研究一下吧。

卡翁达：我想不用研究，我们的意见就可以取得一致，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分



毛主席出席陈毅追悼会（1972年1月10日，八宝山），前排：莫尼克、毛泽东、西哈努克、宋庆龄

析已经很确切了。

毛主席：第三世界人口很多。

卡翁达：确实如此。

毛主席：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此后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副总理率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1974年4月11日，邓副总理做大会发言，首次在国际场合阐述毛主席“三个世界”的重要思想。发言稿是行前由中央和毛主席审定的。

《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这篇发言，其中是这样表述“三个世界”的：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此言一出，世界为之震动。外公对世界的分析给世人以深刻的启示，“三个世界”一词沿用至今，大外交的魅力载入史册。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正式名称是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因此，邓副总理的讲话中专门有谈经济和贸易的内容，也反映外公的一贯思想。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

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十届政协部分女委员合影，左起：王海容、巴桑（藏）、李敏、唐闻生、罗爱伦

抚今追昔

外公晚年会见外宾，多有海容在场。她见证了外公的家——中南海游泳池会客厅高朋满座的盛况，为此感到欣慰和自豪。

1972年，海容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她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其后直到1978年底，海容在外交战线一共工作了13个春秋。此时，对外开放已在毛主席、周总理开创的“大外交”基础上全面展开，这已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段历史了。

海容进入外交部的1965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53个；到总理和外公先后辞世的1976年，中国已与世界117个国家建立过外交关系。不可想象，如果没有建国以来27年的耕耘，没有大外交的培育，何时才能结出后来的累累果实？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随着时光的流逝，外公三十多年前的战略眼光越来越显现其价值。中国真正的开放，就是从大外交开始的。

至此，海容和我的漫谈告一段落。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可喜的是，中国国力不断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也可以告慰先人，告慰外公毛泽东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改变世界的日子 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第2版

作者=

页数= 1 6 5

S S 号=

D X 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书名
目录

第一章	序幕 我有这样一位姐姐 外公的九哥 外公的初恋 到长沙找九哥去 海伢子的童年 “王波”的徒工生涯 与外公的谈话
第二章	1969·初露端倪 一、30年的变迁 二、初到外交部 “文革”之前的中国外交 东交民巷印象 火烧英国代办处 总理出面处理 “文革”前期的外交困境 三、尼克松的一篇文章 尼克松发信号 中美关系由来 四、中苏问题 苏方来电 两手准备 机场会谈 五、外公的预言 基辛格何许人也 “大外交”初露端倪 “追到卫生间”传闻由来
第三章	1970·有朋远来 一、斯诺其人 外公与斯诺 前4次采访 二、中美关系的曲折 五二〇声明 三、斯诺最后一次访华 天安门上 老朋友有请 外公急令 为何会见斯诺 清晨造访 难得的长谈 石破天惊 关于个人崇拜 最后一面 美国人民是朋友
第四章	1971·小球大球 一、两条新闻所引起的 二、美国队访华 要求访华

发生转机
几则外电
外公改变决策
总理巧布坐席
小球与地球

- 三、基辛格访华
 - 入住钓鱼台
 - 秘赴巴基斯坦
 - 初见基辛格
 - 北京 4 8 小时
 - 总理越朝之行
 - 总统访华前的准备

- 四、联合国之行
 - 第 2 6 届联大前的中国外交
 - 来自纽约的好消息
 - 莫忘朋友
 - 总理送行
 - 初到纽约
 - 外国记者的追踪
 - 联合国“中国日”
 - 中国的声音
 - 繁忙的外交
 - “中国胃”的烦恼
 - 两盒巧克力

- 第五章
- 1 9 7 2 · 改变世界
- 一、从布什访华想到的
 - 二、黑格访华
 - 准将打前站
 - 节骨眼上得病
 - 美方的口信
 - 中方的反击
 - 黑格将军失礼
 - 外公指示“升温”
 - 余波淼淼
 - 三、尼克松访华
 - 冷中有热
 - 破冰之旅
 - 突如其来的会见
 - 外公如何准备
 - 基辛格的回忆
 - 关于外公的传闻
 - 中方主随客便
 - 通向红墙之路
 - 总统丢了
 - 游泳池印象
 - 外公的书房
 - 两个“魔鬼”见面
 - 中美最高级会见
 - 北京的雪
 - 杭州“捉迷藏”

上海挽留总理
北京欢迎总理
外交丰收之年

四、与第二世界国家的交往
田中访华

五、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
伊朗公主访华
城楼之夜
长城上跑步
针灸记趣
公主与邓大姐

第六章 尾声

“三个世界”
抚今追昔